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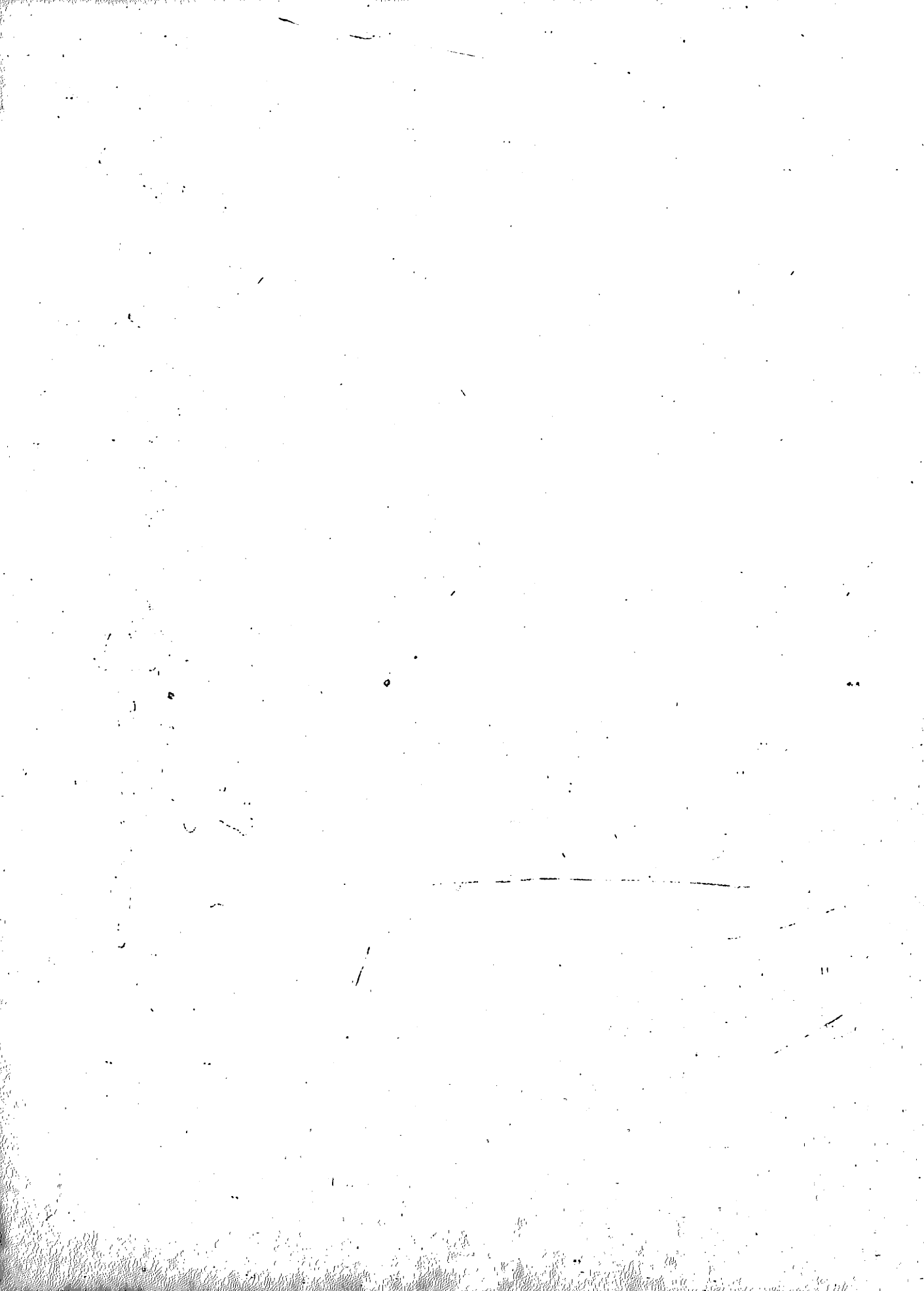
XUEXI YU PIPAN

学习  
与  
批判

杨  
世  
泉  
六  
九  
二  
十

8

1976



## 毛主席语录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六年第八期 目 录

- 中共中央给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电 ..... (3)  
与灾区人民战斗在一起 ..... 本刊通讯 (4)

###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 人与人的本质关系是阶级关系 ..... 翟 清 (9)  
重视研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 ..... 伍 甫 (14)  
必须掌握变化着的阶级关系  
——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 施东晖 (17)  
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阶级关系的变动 ..... 范 贻 (20)  
邓小平是伯恩施坦的忠实信徒 ..... 延 风 (25)  
同邓小平的“条条专政”对着干 ..... (28)

## 这里也是批邓的战场

——北京“仪器仪表自动化装置展览会”侧记……王复初 张立英 (30)

## 经济问题研究

争做发展社队工业的促进派 ……………梁伟刚 (34)

### 为发展社队工业架桥梁

——上海市五金交电公司的调查报告 ……………冯 达 郑树清 (36)

### 穿针引线 大有可为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如何当好发展社队工业促进派的讨论会纪要  
…………… (40)

为什么会“重整车,轻配件”……上海货车制造厂工人理论小组 (44)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商业的出发点  
…………… 豫园商场革命委员会 (45)

努力做发展生产的促进派 ……上海市财政局第三分局小分队 (48)

## 近代史研究

### “社会公仆”赞

——老根据地访问记之二 ……………李长青 (50)

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 ……………杨立强 (56)

## 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 身居要职之后

——评苏修短篇小说《身居要职》  
……………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评论组  
上海师大中文系七三届(1)班工农兵学员 (65)

附:《身居要职》故事梗概 …………… (68)

杂文: 狗的乐园 ……………舒浩晴 (74)

## 社会调查

人间沧桑话“准巴” ……………西藏自治区 李文珊 (75)

八月七日付印  
八月十四日出版

# 中共中央给地震灾区 人民的慰问电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讯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了慰问电。电报全文如下：

河北省、天津、北京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市警备区并转唐山及其附近遭受地震灾害地区的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中央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 与灾区人民战斗在一起

(本刊通讯)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晨六时。

“滴铃铃，滴铃铃……”上海医药采购供应站的电话铃响了：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北京、天津，马上作好一切准备，支援灾区！

.....

灾情就是命令！急促的电话铃声，从这个办公室传到那个办公室；从这个部门传到那个部门，很快就传遍了上海的各条战线。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

最先接到电话通知的上海医药采购供应站党委，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进行紧急动员。在很短的时间里，灾区需要的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清单开列出来了，一支抢运突击队组织起来了。仓库里，干部和工人冒着酷暑，一起进行紧张的搬运；马路上，一辆辆卡车，满载着药品和医疗器材在飞快地奔驰着；机场上，满载着救灾物资的飞机凌空直上，径直向灾区飞去。

在火车站，两列专车也正鸣笛待发。车厢里，八百七十六名医疗队员怀着焦急的心情坐在那里，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向灾区，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同那里的人民共同战斗。这是上海组织的第一批奔赴灾区的医疗队。

二十八日上午，各医院、医学院都紧急动员起来了。走廊里、围墙上，贴满了请战的决心书，市卫生局革委会不断接到请战的电话。仅仅十几个小时，五十几个医疗小分队迅速组成，医疗队员个个精神抖擞，整装待发。他们中间，有的刚从黑龙江、云南、安徽等地参加巡回医疗队回来，立即打起背包奔向新的战场；有的刚从手术台上动完手术，就又参加了抗震救灾的医疗队行列。至于主动请战的，更是连数也数不清。一方遇灾，八方支援；一声令下，全体动员。二十九日清晨六时四十五分和七时二十分，医疗队分乘两列专车向地震中心飞驰而去。

这一天，红色电波传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以及灾区人民奋起抗震救灾的激动人心的消息，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上海人民，上海各条战线都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慰问电，掀起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支援抗灾斗争的热潮。第一批医疗队刚出发，上海市卫生战线又立即组织了近三千名医务人员的预备队，准备了大批药品器械，集合待命。留在上海坚守岗位的广大医务人员，纷纷向党表决心：为了支援灾区，让医疗队同志安心工作，我们坚决把战友留在家里的这副担子挑起来！他们中间许多原来半休的同志主动放弃休息，全天休息的老医生坚持进行全天或半天工作。医院里到处是一片

热气腾腾的景象。

上海医疗队一到抗灾斗争第一线，就在当地抗灾指挥机构统一领导下，紧密配合灾区群众和全国各地前来的抗灾战士，肩并肩地一起投入了战斗。大雨过后，气温骤升。各地去唐山震区的医疗队员尽管唇焦舌燥，但一个个都以顽强的毅力坚守在岗位上。我们上海押送物资随飞机前往震区的同志亲眼看到这种动人的场面，把身边仅有的一壶水递给那些忙得满头大汗的同志，但他们捧过水壶后，毫不迟疑地倒进了身旁一只临时给医疗器械消毒用的小锅里。休小看这一壶水，它体现了我们革命队伍中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体现了在灾区坚持战斗的英雄们的高贵的共产主义品质！

八月一日，市第一人民医院和瑞金医院接待了从灾区来的一批伤病员。伤病员一下飞机，不到两小时，医院就为他们做好了清洁消毒工作，并逐个开始迅速进行了手术治疗。伤员们尽管伤势沉重，但却表现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无畏的英雄气概。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矿工，忍着伤痛，对医务人员说：“如果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我们劳动人民哪能乘飞机进上海的医院来治伤？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我这第二次的生命。我一定要争取早日回到矿上，参加重建矿区的战斗，等到把家园重新建设好了，我还要请上海同志去作客呢！”灾区人民的豪言壮语，给了医院的同志们极大的教育，激励着他们去克服各种困难，努力把救护工作做得更好。

## 二

七月二十八日，抗震救灾的消息也传到了上海食品工业和财贸部门。为灾区人民和赶赴灾区的医务人员准备干粮——压缩饼干，这是他们接到的第一项战斗任务。“我们虽然没有奔赴抗灾第一线，但这里也是同灾区人民并肩战斗的战场！”从机关到商店、工厂，从领导到群众，都紧急动员起来了。

可是，困难却摆在人们面前：最近一段时间，压缩饼干上海已停止了生产，全市到处搜寻，只有七千斤压缩饼干，放在远离市区的仓库里。为了让医疗队及早赶往灾区，上海市烟糖公司党委决定立即组织运输力量，务必在晚上九时前把七千斤饼干全部运回市区。五时半，一辆大卡车风驰电掣般地朝郊区开去。

就在同一天晚上，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大楼里，灯火通明。上海烟糖公司机关的六十多名共产党员，食品一店由一百多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还有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部分战士，都在这里紧张地战斗。八点三十分，压缩饼干一运到，一场争分夺秒的紧张战斗打响了。二百多人排成流水线：拆箱、装包、封袋、清点，以热烈而镇定的情绪，进行着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为了尽快打开饼干听的密封铁皮，一些同志划破了手，鲜血直淌，但谁也不肯放慢速度，仍然飞快地干着。零点三十分，上海果品公司又从仓库运来几百公斤榨菜，分袋装好。凌晨，一包包的压缩饼干、榨菜，同医务人员一起随车出发了。

这些饼干一运走，他们又立即研究灾区人民下一步的需要。二十九日上午，上海轻工业局、上海食品工业公司、上海粮食局、上海烟糖公司，联合召开了紧急会议。分布在全市各区的八个烟糖批发部，在很短时间里，把自己所有的库存饼干共四万多斤，全部包装成箱，从四面八方向机场、火车站飞驰。益民食品四厂生产的七万多斤饼干，正要调往全市各烟糖批发部，支援灾区命令一到，所有的饼干一斤不留，全部送往机场和车站。还有十

万斤为长江航运公司、上海远洋公司生产的救生饼干，也主动调拨出来支援灾区。有了饼干，一时没有搬运工，正在值班的静安区民兵小分队二十八个战士，跑步到厂，立即投入抢救饼干的战斗。二十九日，从中午到夜晚，短短五、六个小时内，向灾区人民援送压缩饼干、普通饼干达四十多万斤。

一场紧张的战斗，也在曾经生产过压缩饼干的益民食品四厂打响了！二十九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慰问电的鼓舞和动员下，全厂上下都行动起来了。压缩饼干由于有一段时期没有生产，机器要整修和消毒，传送带要突击安装。按照通常的工作进度，至少要到三十一日才能开车生产。这就太迟了。抗灾斗争前线的需要，一秒钟也不能迟缓。动力车间机修工人组织了一支突击抢修小组，连夜奋战，终于在三十日凌晨四时，把生产压缩饼干的机器开动了起来。机器运转从一班，到二班，直到二十四小时全部运转。很多同志早班连中班，中班连夜班，连续几个昼夜坚持工作，不少工人把病假条藏了起来，青年工人还组成突击队，利用深夜部分机器维修的时候，轮番作战，千方百计为抗灾前线多增产。短短的几天，在保证原普通饼干产量的同时，压缩饼干的日产量突飞猛进，五吨、十吨、十五吨、二十二吨、五十吨……。

地震灾害严重地考验和锻炼了英雄的灾区人民，同时也考验和锻炼了全国人民。人类社会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成长起来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必将在批邓反右、抗灾斗争中大踏步地胜利前进！

### 三

在全市人民的努力下，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赶制和集中起来，可是，怎样把它们火速送到抗灾前线呢？

航空、铁路、海运系统纷纷紧急行动起来。上海民航局决定立刻铺设一条直接通达唐山的空中铁路。二十八日，运输服务大队以最快的速度装好了灾区人民急需的物资，保证了第一架运载救灾物资的飞机及时启航。机场的同志采取了各种灵活的方式，适应了当前抗灾战斗的需要。负责派载货物的同志，亲临现场，指派各种急待装机的货物，对号入舱；负责运送救灾物资的同志，打破过去在仓库集装的惯例，将货物堆放到停机坪，有时飞机正巧着陆，就直接把汽车开到飞机旁边；负责装货的同志，把前方、后方的力量组织在一起，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做到安全、满载、迅速；飞行员们，更是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在唐山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战云斗雾，绕过雷雨区，安全迅速地将物资运送到了灾区。在短短的四天半时间里，运走了过去二十天才能运走的货物量，保证了这条直通灾区的空中铁路始终畅通无阻。

上海铁路部门，在把八百多名医疗队员送往唐山之后，又承担起了繁重的向灾区运货任务。铁路局调度室的同志，学习灾区人民英勇抗灾的精神，打破常规，原来装货有固定日期，而且有五道手续，现在为了抗灾前线的急需，做到了抗灾物资，随到随装，随装随运，一边运货，一边装车。三十日夜半，有一百五十吨塑料薄膜，需要立即装车发运，杨浦站的装卸工人连半夜餐都顾不上吃，一捆一捆地把货物扛进车皮，上运二场和五场的干部和工人同志们，也都闻讯赶来，在短短四个小时中装完了五个车皮，使这些物资及时地送到了抗灾斗争的前线。



从北方开回上海的客车上,也是一派团结战斗的景象。七月二十九日,十四次列车从北京开出,沿途上来了一批从灾区撤出的老弱病残的同志,有的还负了伤。虽然列车已经多挂了三节车厢,载员仍超编百分之一百。但是,乘务员分外热情、周到地为伤员送水端饭,安排座位。乘客也是彼此相互帮助,互相照顾,主动为从灾区撤出的伤员们让出了卧铺,各个车厢中出现了一片你推我让的动人情景。十四次列车上所发生的这一切,不正是我国人民团结抗灾的一个缩影吗?

#### 四

在中共中央慰问电的鼓舞下,在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的精神教育下,上海的每一条战线,每一个岗位都紧急行动起来了。

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十九日接到了向灾区调运五百顶帐篷的任务。全市民兵,迅速行动,仅仅一个多小时,就把分散在基层单位的帐篷集中起来,全数及时地送到了机场。

在制药和医疗器械战线,广大工人正在为短时间内集中大批救灾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而进行着争分夺秒的战斗。上海制药五厂的早班工人听到厂领导正在公司接受任务,主动等待命令,日夜奋战,仅用二天三夜就赶制了某种急需的针剂原药一吨半。上海注射器三厂接到突击生产五万支注射器的任务,负责包装工序的里弄加工组的大姐大妈们,放下孩子,挨家挨户通知组员提前上班。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全市集中了三十三品种的三千八百万支针剂和十一个品种的五亿片片剂,集中了三十个品种三十六万件和七个品种一千五百台套的各种医疗器械。

在上无二厂和上无三厂,工人们连夜突击安装无线电对讲机。他们考虑到灾区的特殊需要,在原来设计的基础上,每台装上了两套不同的天线,安上了交流、直流两套电源,并配上干电池,保证一到灾区,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能有效使用。

在只有二百多职工的黄浦塑料厂,三十一日上午刚突击生产出一批塑料制品,十点钟又接到加工一批塑料帐篷的紧急任务,许多工人连午饭也顾不上吃,又投入紧张的突击战斗之中。

在上海邮电局,党委提出要求,保证通讯畅通,对有关救灾的医疗、运输、气象、地震等重点通讯,保证做到了及时、准确地传递,并及时组织了通讯电台、无线抢修等六支专业队,陆续奔赴灾区。

在上海储运公司,从公司到基层,除了正常的业务值班以外,每天晚上还增加四百人左右的突击发运队伍,还集中了一批运输车辆,随时准备完成市内运输任务。

“和灾区人民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就是全国人民和上海人民的坚强决心。

#### 五

唐山震区的灾情是极其严重的,但丝毫也吓不倒英雄的唐山人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包扎好自己身上的创伤,向严重的自然灾害展开了坚韧不拔的斗争。当上海第一架运送救灾物资的飞机于当天抵达唐山时,辽宁等兄弟省市的运送医疗队员的飞机已抵达了现场。当时,尽管大震刚过,余震未断,但在中共中央慰问电的巨大鼓舞下,整个灾区充满

了一派人定胜天、团结战斗的革命情景，抗震救灾的指挥机构已经开始工作，灾区人民正在坚定沉着地战斗，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冒着大雨兼程赶来，战斗在灾情最重、最危险的地方。连那里的红小兵们都组织了起来，在医疗人员带领下，四处采集中草药，为抗震救灾作出了贡献。坚持在抗灾第一线的唐山钢铁公司的工人同志表示：“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如今，这些豪迈的语言正在黄浦江畔广泛流传，成为激励上海人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巨大精神力量。

从抗灾第一线回来的同志，还向上海人民介绍了全国各地人民同灾区人民并肩战斗的动人情景。在唐山机场，几乎每隔两分钟就有飞机降落和起飞，它们运来了大批救灾人员，送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粮食、药品、衣服、帐篷、炊具、毯子等等急需物资。近的，来自辽宁、山东，远的，来自新疆。特别感人的是我们的英雄的首都人民和天津人民，尽管受到了地震的波及，遭受到不少损失，但照样不遗余力地向唐山震区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当上海向天津询问需要支援什么时，天津的回答是：“请你们全力支援唐山！”首都人民在坚守岗位、积极抗震的同时，还向唐山灾区紧急运去了大批物资，派去了供电设备检修队和医疗队。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全国人民，就这样地在用自己的行动谱写着一篇共产主义风格的壮丽史诗。

在全国人民团结抗灾之际，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旧中国遇到地震时所带来的饿殍遍野的悲惨图景。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宁夏海源县发生了强烈地震，震中成为一片废墟，当时的报道说：“灾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失所，目不忍睹”，“不死于地震也多死于冻饿”，到处狼狗横行，“群出吃人”，死亡人数达二十万以上。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四川茂汶县发生强烈地震，山陵崩摧，堵塞了岷江，江水断流，形成三个大湖。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样的灾情竟然不闻不问，行若无事。四十五天后，十月九日傍晚，湖坝突然决口，六十米高的江水怒涌而下，光灌县一地，就冲毁良田九千多亩，死亡一千六百多人。

一九三七年，山东菏泽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据报道：“未死者均露宿于院，有席棚者百不得一，无衣无食，……瘟疫盛行……情形之惨，空前未有。”

两种制度两重天。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每次较大的地震都造成了惊人的伤亡，但大多数人都不是死于地震当时，而是由于没有得到抢救而病死、饿死、冻死，由于没有及时救灾而造成水灾等其他灾害而死亡。而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全国人民团结战斗在一起，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愈经磨炼，意志愈坚。目前，抗灾战斗还在继续。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动人事迹，何止成千上万，本文所报道的，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些事实，已足以证明，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任何灾难都是可以战胜的，任何人间的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我们有力量战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也一定有力量战胜任何特大的自然灾害。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本刊记者，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

##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 人与人的本质关系是阶级关系

翟 青

为什么说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阶级关系？搞清楚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自觉地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原始社会中，由于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和产品的分配上都是平等的，因而人与人之间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也是平等的。只是在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差别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奴隶。奴隶所创造的产品不仅全部归奴隶主所有，而且奴隶本人也被当作牲畜、当作商品买卖；甚至随便被奴隶主处死，这就是建立在绝对支配和绝对服从基础上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的关系。到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霸占了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并通过地租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小说《红楼梦》中描写的荣宁二府就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大观园的围墙之内，几十个主子统治着几百个奴才，一面是主子们的穷奢极侈，一面是奴隶们的痛苦呻吟。而在围墙之外，则是处在这些封建家族压迫之下的更广大的劳苦大众。这种地主和农民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表面上，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原则，似乎对人人都是平等的，实际上却掩盖着最大的不平等，即所有人都是资本的奴隶，而资本家则是人格化了的资本。“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马克思：《资本论》），无形的锁链代替了有形的锁链。这就是商品制度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

简略地回顾人类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人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三大差别，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依然是阶级关系。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支配的，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阶级关系。

无产阶级同新老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对立的阶级关系，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切反动阶级对于他们的灭亡从来是不甘心的，他们总是企图在中国复辟，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无产阶级对他们就决不能讲“仁慈”、讲“平等”，而只有运用国家机器对他们实行镇压，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斗争，正是这种对抗性的阶级关系的尖锐表现。至于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他们利用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小官进行压迫，实行白色恐怖。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建国以来我们党内多次出现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林彪炮制《“571工程”纪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到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挑起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些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不是清楚地证明了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吗？

在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阶级关系。一般说来，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是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但是，人民内部也有不同的阶级，由于这些阶级各自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也就不一样；而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仍将

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会反映到人民内部来。当然，人民内部的这种阶级关系，不同于敌我之间对抗性的阶级关系，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也不一样，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但如果对于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只看到其一致的一面，看不到矛盾和斗争的一面，这样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观点，容易上那些“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当。

以工人与农民的关系为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农关系，实质上是巩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问题。在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正由于我们采取了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措施，割断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然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基础上，工人农民两头一夹攻，才逼得资本家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今天，由于工人和农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工农差别仍然存在；由于商品交换事实上还是工农联系的主要经济形式；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除，因此，反映在争夺农民问题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存在着。比如，究竟是以农、轻、重为序，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在正确路线指导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发展商品生产，使工农关系成为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关系，还是竭力扩大工农业交换过程中还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都会直接影响工农关系。过去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特点，就是重工轻农，拼命扩大“剪刀差”，叫嚷“要卡农民的脖子”，其结果就是造成工农之间的尖锐对立，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就会趁机而入，利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渠道，大搞资产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使新资产阶级分子大量从中滋生出来。因此，我们只有对广大工农群众不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打击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罪恶活动，才能发展工农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巩固工农联盟。

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同群众的关系，同样也是受阶级斗争的规律制约的。在人类社会，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都必须有领导和被领导、管理和被管理的分工。这种分工，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一种统治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人民内部的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因而领导和群众之间，“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我党的历史上，党和党领导的军队从来都是按照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内部关系的，领导和群众完全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人员、管理人员一般

是处于脑力劳动的地位，工农群众则处于体力劳动的地位，这方面毕竟还带有资本主义旧的分工的痕迹，而且在分配等各方面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及其观念的影响作用下，如不引起警惕，就有可能出现新的阶级分化。毛主席早在一九六四年就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是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吗？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不平等待人，有事不和群众商量，讲等级，摆架子，不民主，居高临下，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爆发了。因此，不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永远记住“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破除等级观念，坚持与工人群众划等号，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只有这样，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带领广大群众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共同奋斗。

由此可见，即使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也不能自发形成，更不是凝固不变的。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对于人们相互关系上还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要从各方面加以限制，并逐步为其最终消灭而创造条件；而资产阶级总是竭力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力图把他们那套商品交易的原则搬到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来，用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来破坏和代替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在不断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必须坚持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和改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但同时必须看到人们的相互关系又会反作用于所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是前进还是倒退，这同能否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因素。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消极作用就会得到限制，人们相互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就会大大发扬，人民内部就会形成团结战斗、平等互助、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如果领导上的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总想搞点“管、卡、压”和“物质刺激”之类的鬼名堂，利用资产阶级法

权大搞特殊化，那么干群关系就会变成猫鼠关系、主奴关系，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会受到压制，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作风就会在人们中间滋长起来，社会主义所有制便不可能是巩固的。至于在被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人们的相互关系早已改变了性质，成了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了。在这种状况下，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已蜕变为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了。

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相互关系本质上依然是阶级关系，归根到底是承认不承认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切修正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总是要抹杀和掩盖人们相互关系的阶级实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就是用“全民党”、“全民国家”之类的谬论来欺骗和麻痹苏联人民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走资派也是如此，他们拼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阶级消灭了”，“所有人都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相处得象一家人一样。”这其实也并不奇怪。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而马克思主义承认人们的相互关系是阶级关系，则正是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涌现出了大批新生事物，比如，根据“鞍钢宪法”所产生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办企业原则，干部到工人中实行“三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广大干部和各行各业坚持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都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有力措施，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胜利成果，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今天，马克思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任务，我们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努力实施，共产主义的精神正在全国蓬勃发展，新生事物的幼芽到处都在破土而出。但是，必须看到，阶级斗争没有止息，反映在人们相互关系上的斗争也同样没有止息。一切革命同志都应当带头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为最后消灭四个一切而努力奋斗。

# 重视研究社会主义时期 阶级关系的变化

伍 甫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如同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一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展开的。因此，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阶段中阶级关系的变化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如果只满足于概念上的理解，那就会得出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阶级估量，抓不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在这方面，毛主席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毛主席在领导我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深刻地指出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非到民主革命完成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不同时期中，毛主席又及时而深刻地指出了由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制约着的各种阶级关系，如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中国人民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都无不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发生着具体的生动的特殊的变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充当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尾巴。但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由于中日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毛主席就及时指出，不仅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重新参加革命阵营，就连买办资产阶级中的亲英美派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有与我们结成暂时的统一战线的可能。同时，毛主席又指



出，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在与蒋介石结成暂时同盟的过程中，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致重犯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顽固派、中间派、革命派的组成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比如，在抗日战争初期，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翼的地方实力派，是划入顽固派营垒中的；后来，随着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矛盾的加剧，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就及时地把它划到中间派营垒中了。

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说过：“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大变动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始终。只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一天没有结束，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动也就一天不会完结，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认识过程也就不可能完结。为什么在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仍然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甚至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会出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建立后，还是到处可以见到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影响？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有些领导人会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之中？为什么在执政的共产党内，会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刘、林、邓一类如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核心和主要力量已经不在党外而在党内？所有这一切，不都说明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确实发生着深刻的阶级变动吗？不都说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它们双方各自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吗？如果仅仅在口头上承认有矛盾和斗争，而对于这样的阶级关系的变动不调查，不研究，不认识，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能不能正确认识阶级关系的变动，是关系到能不能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大问题。毛主席提出的我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

是在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的。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样有赖于对变动着的阶级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什么有些人会执行刘少奇一类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呢？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由于他们的认识没有能跟上阶级关系的变动，只懂得在某一特定条件下（例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的阶级斗争，不懂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搞不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因而就很容易上刘少奇一类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当。而刘少奇一伙，为了用修正主义路线代替党的基本路线，总是极力把阶级关系的某些变动说成是阶级斗争的消灭，否认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否认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胡说现阶段的任务是搞四个现代化，只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行了。按照他的说法，社会主义社会岂不是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变动和发展了吗？再也不需要搞什么革命和斗争了吗？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就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因此，研究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样地也必须建立在对于阶级关系及其变化作出正确估量的基础之上。不然的话，就搞不清楚在当前的革命阶段上，应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应当怎样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例如在犯有走资派错误的人中，多数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是能够认识错误，吸取教训，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的；但也有象邓小平那样的人，坚持错误，成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们的打击矛头，就是要集中地指向邓小平这样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就要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我国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国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还存在，因此，“走资派还在走”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 必须掌握变化着的阶级关系

——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施 东 晖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是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一个报告。它是指引我国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纲领性文件，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并据以正确地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光辉典范。学习毛主席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对当时各个阶级的分析，以及毛主席如何根据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来规定党的路线和政策，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毛主席在作这一光辉报告的时候，土地革命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即将全面展开，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毛主席在报告中，强调不仅要研究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而且还必须考察它在当前发展阶段上的特征。在整个民主革命历史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完结之时，这个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它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矛盾的两个侧面和被它制约的其他矛盾的变化，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过渡到抗日民族战争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并未变化，我们党仍然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条基本路线。但是，由于主要矛盾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决定了革命进入新的阶段。正如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一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为另一方，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帝国主义对当时的中国革命阵线进行了分化活动，大资产阶级利用共产党内陈独秀投降主义的统治，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民族资产阶级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也叛变了革命，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这样，就形成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动。革命营垒中，这时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反革命营垒中，国民党新军阀代替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民族资产

阶级则成了反革命的附庸。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质虽未变化，但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同，表现为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大众同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中国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又在一九三五年发动了华北事变，于是，中日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把其他各种矛盾推到次要的地位，国内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性在不断地提高。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之后，工农武装割据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只在工农运动曾经蓬勃发展过的南方几省，扩展到了在北方各省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城市工人运动也基本上结束了王明路线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后的沉寂局面，深刻地酝酿着反日反卖国贼的斗争。全国人民正在大规模地起来为抗日救亡而斗争。毛主席指出，这时的革命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工农坚持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这就是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党实行阶级关系新调度的主要依据。

当时阶级关系变化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各个集团的矛盾和分化。毛主席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是说，在革命运动的进程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在不断地变动着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追随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现在，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使它可能重新成为革命的朋友，成为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地主买办阶级在新的形势下也正在发生变化，它们当中的亲英美派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亲日派则正在一步步地投入汉奸卖国贼营垒。正是由于新的历史条件，敌、友、我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无产阶级才有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与地主买办阶级中的某些集团）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研究阶级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区别各个阶级和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以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当前阶段的主要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在当时正是抓住了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进而深入地分析了在新形势下阶级关系的区别，为我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分化敌人营垒，集中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中亲日派的正确路线和策略。毛主席指出：在国际上，“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在国内，必须把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亲日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必须集中力量予以打击。亲英美派同日本有矛盾，又同人民有矛盾，应当争取它参加抗日阵线，同时对它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为此，我们党对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根据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态度，在策略上作了相应的调整。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的过程中，这个阶级及其主子同日本侵略者之间发生了利害冲突，但是当时的矛盾尚未到达激烈的程度，蒋介石的基本政治态度仍然是对外卖国，对内进行反共内战。所以，党中央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实行“反蒋抗日”的策略。以后，随着英美帝

国主义及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激化,人民抗日运动的日益高涨,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此,党中央及时地在一九三六年五月由“反蒋抗日”转而采取“逼蒋抗日”的策略。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被迫放弃内战政策,新的国共合作开始形成,这是党的“逼蒋抗日”策略的胜利。此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增强,民族资产阶级不断转向抗日,地方实力派的分化加剧,使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继续向着参加抗日阵线的方向发展,我们党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进而从“逼蒋抗日”转到采取“联蒋抗日”的策略。研究这个变化过程,说明了只有分析各阶级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动向,才能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

历史经验证明,离开对阶级关系变动的调查和研究,就必然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在当时,王明推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路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闭起眼睛,根本不承认由于中日矛盾上升而引起的阶级关系变化的事实。他们抹煞阶级关系的变动,就不可能把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非主要敌人区别开来,也不可能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中产生的新的分化,甚至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来打击。他们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不仅如此,就在党集中力量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以王明、刘少奇等为代表的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已逐渐发展起来,他们从右的方面歪曲华北事变和西安事变后阶级关系变化的性质,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在政治上逐渐从关门主义倒向投降主义。为此,毛主席在批判新起的投降主义倾向时指出,国内阶级矛盾之所以变成次要的和服从的东西,是因为中日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发生了变化,“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党实行阶级关系的新调度,直至和国民党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不过是适当地调整这些矛盾,决不是实行阶级调和。为了防止重犯陈独秀路线的错误,毛主席谆谆告诫全党:“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今天,中国革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矛盾,转化成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尽管主要矛盾在性质上起了根本的变化,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各个阶段对阶级关系变动所作的调查和分析,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制订出路线和政策,在今天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就必须深入调查今天的阶级关系,研究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动。而要搞好阶级关系的调查和分析,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批邓,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正如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结尾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 十月革命前后 俄国阶级关系的变动

范 贻

任何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关系变动。分析一下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可以帮助我们生动地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说得很深刻：革命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是随着革命的进展而变化的。（《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在俄国，革命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一九〇五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发生的第一次人民革命。这次革命遭到了沙皇政府血腥镇压以后，俄国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一九一七年二月，又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十多年间，各个阶级的面貌都得到了检验。以沙皇为首的一小撮农奴主和地主极端反动和腐朽；大资产阶级极端仇视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自由资产阶级虽然采取了反对沙皇的立场，但他们害怕人民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竭力想通过同君主制的妥协接近沙皇政权。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基于这种阶级关系，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民主革命中不仅领导了小资产阶级，并且有可能领导了自由资产阶级推翻了君主制。但阶级关系随即发生了新的变化。自由资产阶级在篡夺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以后，便力图结束革命，把革命纳入君主立宪制的轨道。当革命真正发展到要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时，他们就公开地镇压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完全成了反革命的阶级。同时，曾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曾经倒向无产阶级，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是一个经济地位极不稳定的阶级，政治上始终摇摆不定。他们为了能在资产阶级政府那里分得一席之地而出卖革命，起着掩护资产阶级的反动作用。

列宁在总结二月革命以后阶级变动的新形势时指出：“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发生变化。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现在站在‘街垒两边’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些阶级了”。（《政论家札记》）阶级关系变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对象也变了。过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以及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而现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存在着三种基本力量：首先是无产阶级，它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其次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它一下子变成了被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还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村的广大农民，这个阶级又分化为若干阶层，情况非常复杂，他们可以跟着无产阶级跑，也可以跟着资产阶级跑。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而给阶级斗争带来更深刻的内容，更复杂的形式。正如列宁所分析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阶级斗争的状况，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论断。一九一八年夏季，英、法、日、美等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武装干涉，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同它们相呼应，到处策动反革命暴乱。城乡资产阶级利用国内战争时期的困难，煽动怠工，搞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还能够同无产阶级抗衡？主要是由于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占有很大的优势，他们还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大量的财产和金钱，他们还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有着比无产阶级更深厚、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同时，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那就是一批为资产阶级所豢养的知识分子，公开利用他们的知识反对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此外，资产阶级还有国际基础，他们本身就是国际资本的一部分。

农村的阶级斗争也在激烈地进行。在十月革命时，只是打倒了农奴主和大地产所有者。当农民仅仅要求平均使用土地时，农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不是那么明显地表露出来。到了一九一八年夏秋，由于富裕农民抗拒苏维埃余粮征集制，爆发了全国性的富农暴动。他们和地主、资本家结成反动联盟，制造粮食危机，并以骇人听闻的血腥手段残害工人和贫苦农民。富农的反革命叛乱，使贫农从实际生活中懂得了他们的利益是不能同富农的利益调和的，于是贫农觉醒起来，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单独组织贫农委员会向富农——农村的资产阶级展开了生死搏斗。列宁认为农村阶级的分裂具有不可比拟的深刻意义，农村不再是统一的了，必须在农村把富农这个俄国最后一个剥削者清除出去，才能使俄国革命完全走上社会主义轨道。

俄国农村阶级状况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也起了很大变化。拥有大量耕地的富农和缺少耕地、农具的贫农的人数大大减少，而中农增多了，这使俄国农村变得更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在国内战争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不仅直接威胁着苏维埃政权，也直接威胁着农民的革命成果，因此，农民愿意经受经济破坏的极端困苦，把余粮无报酬地交给国家，支持红军作战。但在国内战争胜利以后，农民就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困苦的重压，不愿意再将余粮无报酬地交给国家

分配,在农民中爆发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行动,与无产阶级专政发生了尖锐冲突。当时,列宁曾指出俄国革命的命运就以能不能战胜这种势力为转移。列宁说,昨天我们曾遇到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复辟的危险,今天,同样是这个复辟危险,又表现为别种形式,即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的进攻。“如果俄国的无产阶级软弱无力,那末光是这种力量的一致就可以摧毁俄国革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这就表明,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确处理好工人和农民的关系,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上阶级关系的变动必然会更直接地深入到执政党的内部来。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十分重视在党内和苏维埃机关内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官僚分子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腐蚀和破坏着党的肌体。他们之中,有的人本来就是老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分子;也有一些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工人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还有一些人是由于醉心于资产阶级法权,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而堕落成为新官僚、新资产阶级的。他们身居要职,利用执政党的地位享受着特权,拼命地捞取好处。事实证明,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比老资产阶级要厉害得多。列宁称他们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危险。

列宁通过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动来制订正确的路线和斗争策略,说明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无产阶级政党“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稳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上”。(《论策略书》、《远方来信》)列宁不仅这样强调,而且在实践中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在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正是正确分析了当时阶级关系变动的状况,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不失时机地把革命从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由于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农苏维埃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曾设想用和平发展的形式来达到这个目的,但后来正如列宁所宣告的那样,阶级斗争的现实说明了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无产阶级惟有坚定地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纲领。列宁把一切拖延武装起义的言论和行动痛斥为对革命的最大的犯罪。十月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列宁对当时阶级变动的分析和武装起义的路线的正确。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通过不断解剖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把握住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和新形式,并以此为据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保证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由于资产阶级还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由于还会出现新资产阶级,由于广大动摇不定的小生产者还可能跟资产阶级跑,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因此,阶级关系的变动表明,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无



产阶级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还必须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根源,进一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则比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农民占了俄国人口的大多数,这是“一个特殊阶级”。(《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作为劳动者,他们仇视压迫他们的地主、资本家,在实际生活的教育下能够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作为私有者,小商品生产的经济地位又使他们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倾向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发生矛盾和斗争。因此,必须对农民进行改造和教育,但这只能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一九一九年列宁就提出了从过去中立中农的政策改变为同中农结成联盟的政策。一九二一年列宁在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和实施种种必要办法,以保证对农民的领导,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并且通过许多逐步的过渡,转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公有农业。”在国内战争过渡到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农民问题是很突出的。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不断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成了当时的一个首要问题。但是寻求与农民共处的新形式却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事情,必须根据阶级变动的特点采取正确的政策。过去,在革命初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每个农民都认识到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战胜他们的世仇——地主,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但是在战争结束后过渡到经济建设时期,旧有的形式已经不再适用了,工农关系必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列宁采取的新经济政策,是一个既能迅速恢复农业,又能恢复和发展工业,巩固工农联盟的政策。正是通过这个政策,才找到了适合于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工农联盟的新的结合点。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俄国革命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时期,也是对内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它体现了阶级关系新变动的特点。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其中包括粮食周转自由、租让制等等,又都必然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斗争的方法改变了,危险的条件也改变了。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的时候,危险来自政治方面;国内战争爆发后,就出现了军事上的危险;而当改变了经济政策后,资本主义的一定恢复,它带来的危险比过去任何危险更加严重。因此一方面既要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国家的监督和领导,进行必要的限制。实际上,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在新形势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生死斗争。全部问题仍在于谁战胜谁?谁能够更快地利用这种形势?是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还是由资产阶级征服农民?因此新经济政策在当时虽然是必不可少的退却,但是它不仅仅是退却,而且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以后的事实证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英明和正确。一年以后,俄国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中农都靠向了无产阶级。于是,列宁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准备向私人经营的资本进攻”。(《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发言的提纲》)

一九二三年，列宁在重病期间，又提出了合作社计划，坚持一九一八年十一户贫农建立起第一个农业公社的方向，为千百万农民由个体经济过渡到大生产协作组织集体农庄的道路，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巩固工农联盟进一步指明了前途。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表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离开了革命进程中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作出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例如托洛茨基主义，在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上就别有用心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势必侵害农民的利益，与“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政治上愚昧无知的农民，“完全不能为无产阶级的彻底有效的政策创造可靠的基础”，相反，“对无产阶级采取敌对的态度”而背弃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荒谬的理论，实际上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取消革命的反动理论。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哈林，则否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会出现阶级分化，甚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使任何剥削都成为不可能的事”。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在列宁逝世后发展到了极其荒谬的地步，他认为富农和资本家、承租企业家都可以不经过阶级斗争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体系。这完全是一种“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的这些错误政策，在阶级斗争现实面前都遭到了彻底破产。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还通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削弱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反对了资本主义复辟。

回顾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阶级变动的分析，以及所采取的路线和策略，可以使懂得研究阶级关系变化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列宁曾经说过：“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应该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个革命政党，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区别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甚至会不知道资产阶级这个主要敌人在哪里，看不见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危险，因而也就不能真正做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制定自己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要避免犯这个错误，就必须对阶级关系的变化进行系统的周详的调查研究，了解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态度，从而作出正确的而不是唯心的阶级估量，并且还要懂得阶级关系是随着革命的前进而不断变动的。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一指示正是分析了当前阶级关系变化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坚持阶级分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邓小平是伯恩施坦的忠实信徒

延 风

修正主义者，总要极力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他们的鼻祖伯恩施坦有一句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列宁曾经尖锐指出，这句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伯恩施坦的忠实信徒。

纵观邓小平的历史，虽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卷进了共产党的队伍，但是他根本没有接受党的最高纲领，根本不承认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他虽然在反帝反封建这点上同无产阶级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在革命领导权、革命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上却从来没有一致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干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想的是共产主义大目标，而邓小平却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理想，标榜自己“是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旗下的国民”，宣称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邓小平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冰炭不相容的。如果不是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他身体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还停留在那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上。一九五六年修改党章时，他公开叫嚣：“党章条文不要加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他背叛党的最终目的的一次大暴露。有时候，他口中也出现一些“共产主义”的词句，但无论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是怎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在什么是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他宣扬“每家都有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一台电视机，每人每年六十斤肉，每天半斤苹果，再加二两白干”就是“共产主义”，什么“所有的人生活都象我这样，就成了共产主义了”。这种只讲吃、喝、玩、乐，充满着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享乐至上的“共产主义”，是道道地地的赫鲁晓夫式的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在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问题上，他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要循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足迹前进，“通过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切都表明，邓小平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称号，可是他丝毫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在他的身上，显现的始终是个伯恩施坦的幽灵。

“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对于伯恩施坦这种信条，邓小平是精通入微的。伯恩施坦不是说“运动就是一切”吗？邓小平就来了个“一切为了现代化”。你看，现代化就是一切，

最终目的还算得了什么呢！邓小平就是利用革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愿望，把目前工作和长远目标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鼓吹种种蛊惑人心的口号，用腐烂发臭的资产阶级思想限制人们的眼光，千方百计从革命人民胸中抹掉共产主义大目标；他大搞“五子登科”式的许愿；引诱革命人民只看到鼻子尖下的蝇头小利，变成房子、票子、妻子、儿子而奋斗的政治庸人。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教导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每个共产党员应当如何处理当前工作与长远目标的关系。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每个共产党人都应当自觉地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无论在什么革命阶段上，始终目光远大，着眼于“将来的大目标”，同时又看到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立足于“今日的努力”。只要我们把眼前的工作和实现大目标结合起来，一步步把社会主义革命引向深入，就会一步步向共产主义迈进。

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旧的痕迹怎么看？这是正确处理“将来的大目标”与“今日的努力”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这类旧的痕迹，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从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来看，它毕竟是要衰亡的资本主义因素。“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在承认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同时，总是强调对它限制的必要，允许它目前暂时存在，是为了将来消灭它。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正是为实现将来大目标的今日的努力。

而早把共产主义大目标抛到九霄云外的邓小平，就象苍蝇逐臭那样，啧啧赞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旧的痕迹，把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级差别等所反映的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天经地义的，谁也触动不得。他大谈这些旧事物的合理性，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什么“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就是不讲它们不合于共产主义之理；他大谈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必要，就是不讲它们衰亡的必然；对于这些旧土壤会产生资产阶级新毒草的严重危害，更是讳莫如深。反正“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装满资产阶级腰包，管它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种哲学，不就是“最终目的微不足道”的邓记注解吗？其实，如果放松了今日的努力，不去努力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不要说向共产主义过渡根本不可能，就是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也会丧失殆尽，资本主义就会复辟，而这正是邓小平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

对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无限迷恋，对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就必然格格不入。邓小平对于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生事物，恨不得把它们一口吞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他强加给新生事物的一个罪名，就是“超越社会主义阶段”。我国广大农村办起合作医疗，改变了原来缺医少药的面貌，邓小平攻击说是“刮共产风”，工农兵学员毕业之后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和工农划等号，邓小平一伙攻击我们是“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这种攻击不仅表明了邓小平对什么是共产主义根本一窍不通，而且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反感和仇视。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农兵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难道这是什么“超越阶段”吗？难道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是始于今日，而是要等到不知哪年哪月的遥远的将来吗？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晚上会突然从天而降的，任何事物质的飞跃总是要通过量变的不断积累才能实现的。今天，茁壮成长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地上的新生事物，正是共产主义的幼芽。我们满腔热情地扶植这些幼芽，促使它成长壮大，就能促进旧事物的死亡，共产主义因素的发扬。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我们当然不能做那些客观条件还做不到的事，但是我们更不能忘记我们的远大目标。邓小平一伙借口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阶段，扼杀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新生事物，不仅仅是屠杀了现在，而且屠杀了将来。他们反对“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临时应付，随波逐流，迁就眼前事变，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伯恩斯坦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狂热鼓吹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良经济状况而斗争”，胡说什么“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等等。总之，他们对共产主义不屑一顾，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邓小平不正是踩着其修正主义前辈的脚印走的吗？

修正主义者否定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的”，他们是不是就没有“最终目的”了呢？当然不是。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岂止是看作“微不足道”，简直视若洪水猛兽。相反，对于他们自己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不但不是“微不足道”，而是当作“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头等大事。从老的社会民主党人到现代修正主义，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概莫能外。

一百多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迂回曲折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着，前进着。“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全人类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每战胜一次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就向这个伟大目标迈进一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更具体了，从而迈向共产主义的信心更坚定了。不管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

# 同邓小平的“条条专政”对着干

我们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电机厂、上海锅炉厂和上海汽轮机厂，是机电一局在闵行地区的四个直属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物资工作人员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在物资调剂工作中，出现了不少讲路线，顾大局，发扬风格，积极支援兄弟单位，把困难留给自己的先进事迹。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我们在对待物资调剂的态度上，有时往往缺乏全局观点，把归自己分管的物资当作是一个厂、一个单位所有，而不是把它看成全民所有制的物资。我们这四个厂虽然都在闵行地区，有的还是一墙之隔，很多产品相互配套，按理应当相互关心，在物资上互相进行调剂。但是，有些搞物资工作的同志，往往抱着一种错误想法，唯恐“嘴巴松一松，马上就出送”，很少互通有无。久而久之，各单位也就习惯于各搞各的“储备”，各找各的“门路”，遇到生产上急缺原材料，首先是向上伸手要，或者是四出求援满天飞，却不在百步之内搞协作。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四个厂供应部门的干部和群众，联系物资工作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了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家感到，在物资工作中所以存在这些问题，根本的原因还是受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特别是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就强化“条条专政”，挥舞“整顿”大棒，大搞管、卡、压。他搞“条条专政”，变全民所有制为部门所有制，这就助长了下面搞小单位所有制，搞小团体所有制。明明是国家的财产，国家的物资，宁可积压在仓库里，不肯拿出来调剂，不肯支援兄弟厂的急需。所以，下面出现的这种问题，根子在邓小平的“条条专政”。我们这四个厂，都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虽然各个厂的分工、任务不同，但都属于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在处理物资问题上一定要有全局观点，要以共产主义思想挂帅。这样，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让邓小平推行“条条专政”的阴谋得逞，大搞部门所有制、小单位所有制，这样发展下去，势必改变我国全民所有制的性质，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变成为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我们决不能上这个当。

通过批邓，大家提高了认识，决心在物资工作上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四个厂就组织起来，每月进行一次物资的互助调剂活动。走资派搞部门所有制，搞小团体所有制，我们就树立全局观点，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在互助调剂活动中，四个厂互通有无，互相支援，把兄弟厂的困难看作是本单位的困难，把支援兄弟单位从过去的“情面难却”变成自己应尽的责任，协作风格越来越高，相互关系越来越好。调剂

的数量，平均每次要达到二百五十吨以上。七个月来，已调剂一千八百多吨，出现了“一盘棋大家走，龙江水四厂流”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例如，上海汽轮机厂二月份生产上急缺某种薄钢板，上海重型机器厂有这种材料，但本单位生产上很快也要用；上海锅炉厂也有这种薄钢板，不过是卷筒钢板，需要平整后才能使用。在这种情况下，重型机器厂就主动提出把本厂的薄钢板先支援汽轮机厂，自己从锅炉厂调进卷筒钢板，进行平整以后再使用，终于解决了汽轮机厂的急需。又如，重型机器厂四月份生产上急需两种紧张材料，数量又大，如果照过去的办法，向上伸手要，万一不能迅速解决，势必影响生产。如今，一个厂发生困难，三个厂主动分担，锅炉厂、电机厂和汽轮机厂把本单位暂时不用的材料，及时支援了重型机器厂。我们几个厂的物资工作人员深有体会地说：“四家仓库如一家，团结协作力量大，促进生产大发展，新型关系人人夸。”

我们四个厂在开展物资互助调剂活动中，还坚持依靠广大群众。毛主席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广大工人群众是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自然也是物资工作的主人。但是，邓小平却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按照邓小平鼓吹的这套“相对依靠”论去搞物资工作，那也就必然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只靠少数计划员、采购员来搞。现在，我们批判了邓小平的“相对依靠”论，采取三结合的办法，让计划员、采购员、保管员、工人代表一起参加调剂活动。这样做，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开展物资调剂工作的意义，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支持。比如，我们在开展物资调剂活动中，由于相互进行无私支援，往往产生这种情况：一种材料本单位刚刚进库，保管员刚刚整理好，马上就要调出去，给保管员带来很大麻烦。因为大家看到了开展物资调剂的意义，感到虽然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但是对于兄弟厂来讲，能够及时解决生产上的困难，这是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应有的新型关系，因此都不怕麻烦。不少同志说：这样的调进调出，即使再麻烦，我们也愿意干。

我们四个厂开展物资互助调剂活动，还仅仅半年多时间，但我们深深感到，用共产主义思想开展社会主义协作，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搞好物资工作，这不仅能够挖掘物资潜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现在，我们正在总结经验，加以发展。目前，已经从金属材料的调剂，发展到其他物资的调剂，并且准备把各厂的物资潜力相互交底，还准备以后去外地催货、调运物资时，也进行互助协作，防止过去那种相互竞争的错误倾向。我们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深入批邓，使我们的物资管理工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搞得更好。

(本文系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电机厂、上海锅炉厂四厂党委在市委、市革委会召开的认真学习、深入批邓经验交流会上的联合发言稿)

# 这里也是批邓的战场

——北京“仪器仪表自动化装置展览会”侧记

王复初 张立英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参观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在北京举办的“仪器仪表自动化装置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上的每一件展品，都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情歌颂，是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

邓小平一伙不是恶毒污蔑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今不如昔”吗，究竟是“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走进展览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全国仪器仪表工业分布图。看到这个分布图，许多来参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心情十分激动。是啊，且不说解放前吧，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为数不多的仪器仪表厂，也大多分布在上海、天津、广州、江苏、辽宁等沿海一些省市。可是现在，就象这个分布图所显示的，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我国的仪表工业已是星罗棋布、遍及全国各地了。

如果说分布图显示的还是一个我国仪表工业发展的概貌，那么，展览会上琳琅满目的一千九百多件展品，就更具体生动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仪表工业胜利前进的脚步。

大型成套自动化仪表装置，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自动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仪器仪表，只能达到为五万千瓦发电机组、年产一百万吨的炼油厂、三十吨转炉提供成套装置。而现在这里展出的，不仅有已经制成的用于三十万千瓦火力发电机组、年产二百五十万吨炼油厂，二千立方米高炉、一百二十吨转炉等大型关键设备的成套自动化仪表装置的图片 and 模型；还有正在试制的规模更大的成套装置的模型，其中一个管线工程的配套，就包括几十台各种计算机和十五万台、件各种仪器仪表。

展览会上还展出了许多高级精密测试仪器。比如，高达九米多的六百吨大型结构试验机，准确度达到千万分之一的基准电阻，最高可以测到六千度的光学高温计，可以进行从氢到铀的全元素分析和同位素分析的直接成象离子分析仪等，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展览会上，我们还看到一台“色谱——质谱计”，它可以对各种复杂成份进行快速定性、定量分析，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地球化学、药物、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而生产这台仪器的北京分析仪器厂，在文化大革命前还只能



生产单一的质谱计,而且主要是仿造外国的。

在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指引下,农用仪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次展览会上展出的就有三十三种。有一台激光育种机,可以选择、培育出具有早熟、高产、优质、抗病、抗倒伏等特性的优良品种,这是我国农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进展。

毛主席曾经痛斥那些患有右倾顽症的人说:“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邓小平这伙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对于广大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成就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们就是这样的瞎子。他们狂叫“今不如昔”,根本目的就是为过去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但是,这个展览会铁一般的事实,对于他们的谬论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展览会仪表材料元件部分,我们看到一种微型焊接波纹管。别看这种波纹管只有一粒花生米大小,它可是同帝国主义、洋奴哲学斗争的产物哩。

讲解员同志告诉我们,这种波纹管是卫星通讯地面接收站调速管的一个关键元件。开始,有关部门想从外国进口一些调速管。可是帝国主义却趁机卡我们,把原价四万美元一只,提高到五万美元,并指定要用五十吨花生米换一只调速管。这个消息被邮电部第一研究所和南京七七二厂的工人同志知道后,他们非常气愤,决心“造出‘争气管’,打击帝修反”。但在试制焊接波纹管这个关键设备时,遇到了困难。消息传到了沈阳仪器仪表研究所。这个所虽然过去从没搞过这样小的箔片焊接工艺,也没有相应的技术设备,但他们了解到这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就坚决把这个任务接了下来。没有设备,他们就来个土法上马、土洋结合;没有经验,他们就先研制一台适于焊箔片的微束脉冲等离子焊接装置,并进一步同南京七七二厂的工人同志一起,从几百次的失败中,边摸索、边改进,终于克服了结构小、膜片薄、焊缝密、变形大等一系列困难,造出了第一只微型焊接波纹管。说到这里,讲解员同志总要用豪迈的语气说:波纹管的研制成功,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一曲凯歌,是对帝国主义封锁政策的沉重打击,是邓小平所鼓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又一次破产。

邓小平一伙不是打着“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拚命鼓吹“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并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吗?究竟是自力更生靠得住,还是依赖外国靠得住?焊接波纹管的诞生,就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中国工人阶级是有志气的。在展览会上,我们就到处看到这样的“争气管”、“争气机”、“争气表”。有了这样的革命志气,西方资产阶级能做到的,中国工人阶级也一定能做到;西方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中国工人阶级也一定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到。齿轮单面啮合全误差检查仪的制造成功,就是一个证明。长期以来,国内外齿轮测试技术一直采取两种比较落后办法,一种是分别测量单项误差的办法,一种是用单面啮合仪进行综合测量。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全面正确地对齿轮进行测量。直到一九七三年,外国一个资产阶级“权威”还硬说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外国资产阶级“权威”的话,难道是不可动摇

的“金科玉律”吗？不！中国工人阶级从来就不信这个邪。一九七〇年，成都工具研究所、北京量具刀具厂、上海齿轮机床厂等二十多个单位，组成一个单面啮合试验小组。他们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打破洋框框，采取各种土办法，进行了反复试验，终于总结出了我国独创的齿轮测量新原理，研制成功了一台齿轮单面啮合全误差检查仪。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邓小平一类走资派，一面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一面根本否定中国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胡说什么依靠工人阶级“是相对的”，两相对照，不是充分暴露了他们那一副崇洋卖国的丑恶嘴脸吗？

离开“自动化仪表馆”，我们来到“数控机床馆”。数控机床是这次展览会上很引人注意的展出项目之一。它们可以根据编制的程序，自动进刀、退刀、换刀，自动加工，还能自动进料、落料，把加工好的工件送到下一道工序。观众们对工人门的精彩表演看得入神。

然而，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展览会上绝大多数产品都是实行工厂、学校、科研单位“三结合”研究的成果。比如，数控五轴刻字机，只有一只落地收音机那么大，机床五根刀轴，能同时在五只照相机壳体底板上刻各种精细的小字，字体清晰。这台刻字机，就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开门办学中和昆明铣床厂、北京照相机厂等单位实行“三结合”研制成功的。

工厂、学校、研究所实行“三结合”，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它既体现了“开门办学”、“开门办所”的正确方向，又是一场工人参加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对此，邓小平这类走资派当然也拼命加以反对。他们诬蔑开门办学是“不学文化”，咒骂开门办所是“不务正业”，诬蔑“三结合”是“三凑合”。难道他们仅仅只是反对“三结合”这种形式吗？不。从展览会上一台自动换刀数控镗铣床诞生的前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罪恶目的，是要反对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划等号，反对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台机床是北京第八机床厂、北京机床研究所等单位协作试制成功的。文化大革命前，这两个单位虽然是一个党委领导，而且同住一个院，进出一个门，但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研究所搞的是专家治所，关门搞科研。有的人把数据当作私有财产，工人连碰都不能碰，研究课题也不从生产实际出发，工人同志说是“科研科研，越研越玄”。由于这样，文化大革命前八年，没造出一台能供生产使用的数控机床，而且造成了研究人员同工人的尖锐对立。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和研究人员一起批判了“技术私有”、“三脱离”等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黑货，工人群众参加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科研人员走出大楼到车间，与工人相结合，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人们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几年来，他们共同承担了全国数控机床技术大会战的许多任务，完成了二十九项研究课题，绝大部分用于生产实际。展览会上这台自动换刀数控镗铣床，就是他们前年共同战斗的成果。

事实雄辩地证明，“三结合”开门搞科研，决不是什么“三凑合”，而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立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而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不仅

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重要保证。

当我们看完最后一件展品，走出展览会，我国仪器仪表工业前进的历程仿佛再现在我们的眼前。诚然，展示在这里的产品，仅仅是全国几年来仪器仪表工业的一部分成果。但是，仅就这些事实，不是充分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吗？

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历史过程，正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据展览会负责同志向我们介绍，解放后，仪器仪表工业的发展，就曾经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低潮。一个高潮是一九五八年，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仪器仪表工业从几十个厂一下发展到一百多个厂。但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刘少奇跳出来反攻倒算。邓小平也大叫要“退够”。就这样，工人群众自己办起来的仪器仪表厂，被他们这些走资派砍掉三分之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大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我国的仪器仪表工业才又获得了迅猛的发展。

革命推动了生产，斗争教育了人民。广大工人群众从斗争中越来越深刻体会到，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危险的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大的阻力，是他们所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正当去年邓小平一伙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广大工人群众就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斗争的继续。因此，不管刮什么风，掀什么浪，他们坚决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据“元件材料馆”统计，这次展出的仪器仪表专用设备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搞出来的展品，就占百分之七十。

展览会上有一台天象仪模型，是观察多种天体运动的大型精密光学仪器。这台天象仪，是北京光学仪器厂的工人，为了打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垄断，怀着革命豪情，主动向上级部门请战的。但是去年七、八、九月，正当天象仪紧张试制时，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吹到这个厂里，一时间，各种奇谈怪论不一而足，对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冷嘲热讽，指责刁难。但是，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在党委领导下，顶逆风，战恶浪，坚决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盛夏，骄阳如火，在安装室里，由于来不及安装空气调节设备，室内闷得象蒸笼，乙醚和酒精的浓度很大，但大家想到这是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用冷水冲一下，又继续战斗。严冬，寒风怒吼，工人要连续在露天工作，把上百支管子注满水银。大家的手冻僵了，但想到是在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活动活动手脚又干起来。为了使总装任务提前再提前，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不讲条件讲路线，不计报酬比贡献。有的工人为了一个部件的精度，为了测定一颗星星的位置，连续战斗几十个小时，眼熬红了，腿累酸了，但是看到调试工作取得了进展，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增添了一颗炮弹，再苦再累心也甜。就这样，今年五月一日，我国第一台大型天象仪一次装调成功了。

翻案不得人心，倒退没有出路，搞资本主义复辟决没有好下场。不管邓小平这类走资派对社会主义事业诬蔑也好，咒骂也好，中国人民终将把一切绊脚石抛在后头，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 争做发展社队工业的促进派

梁 伟 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郊区农村的社队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对于加速农业机械化,促进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巩固工农联盟,缩小工农、城乡之间差别的深远意义,已经并正在充分地显现出来。

但是,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一些糊涂或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认识。这些观点如果得不到澄清,势将或多或少地阻碍着社队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能不能把全民所有制企业支援社队工业的发展说成是“倒退”?不,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当然比集体所有制要高。但这种差别的存在,正是反映了在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消除。如同任何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一样,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发展,也有一个由小集体向大集体、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过程。而支援社队工业的发展,不断巩固和壮大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的力量,正是为将来逐步实现这个转变创造条件。这明明是前进,怎么能说是倒退呢?列宁说得好:“国家帮助公社仍然是必要的,如果国家不帮助各种集体农业企业,那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就是不拥护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因此,你如果是真想要逐步消除在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推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前进步伐,就应当充分发挥全民所有制作用,为壮大集体经济而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

能不能把支援社队工业的发展,看作是“背包袱”、“添麻烦”呢?不能。我们应当充分认识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加强工农联盟,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革命中,农民阶级始终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我们要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就首先必须发展与提高农村的集体经济。毛主席历来强调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工业要注意大、中、小并举,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而发展社队工业,正是办好中、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直接或间

接地为农服务的。同时，发展社队工业，反过来对大工业本身也是一个支援。有些产品下放到社队工业，大工业就可以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大工业的一部分下脚料，社队工业也可以进行综合利用，化废为宝；还有某些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大工业不可能完全包揽，社队工业在这方面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助手。我们还必须看到，发展社队工业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既然这样，我们怎么能把发展社队工业看作是“添麻烦”、“背包袱”呢？

“搞社队工业，会不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呢？”这种担心反映了没有从路线上去看问题。“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发展社队工业同样如此。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有利于发展农业，还是钞票挂帅，削弱农业；是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还是贪大求洋，搞大少爷作风；是坚持亦工亦农，还是扩大工农差别；是坚持按照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的原则办事，还是利用商品交换，刮资产风，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过去有些地方有资本主义倾向存在，关键并不在于社队工业本身，而是在于没有能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发展社队工业。因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抵制资产风的侵蚀，促使社队工业沿着正确的轨道更加蓬勃发展。如果不从路线上划清界限，而是采取因噎废食的态度，放弃社队工业这个阵地，倒是有可能造成工农、城乡的尖锐对立，以至城乡资本主义势力趁虚而入，挖社会主义制度的墙脚，瓦解工农联盟。这倒是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

发展社队工业，关键在于各级领导重视。对工商业部门来说，既要发挥大工业的优越性，加强对社队工业的支援，又要依靠群众发挥上下两个积极性，尽可能地沟通物资供应的渠道。对财政部门来说，要做好“穿针引线”“铺路架桥”的工作，要帮助社队工业建立正常的财务制度，合理使用积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搞好财政监督。对农业部门来说，应当把为农服务放在发展社队工业的第一位，同时做好为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的也要为大工业服务、为出口服务；对劳动力的安排也要得当，努力做到亦工亦农；要注意勤俭办企业，缩小工农差别。总之，发展社队工业，领导是关键，根本在路线。我们一定要从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的高度出发，坚持使社队工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早在一九五九年，正当人民公社出现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时，毛主席就曾高兴地指出：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今天，我们的社队工业虽然还比较幼小，但它是在向共产主义前进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热情支持它，力争做发展社队工业的促进派。

# 为发展社队工业架桥梁

——上海市五金交电公司的调查报告

冯 达 郑树清

上海市五金交电公司，主要是负责本市工厂生产和人民生活使用的各类五金交电产品的调入、收购和批发供应的工作。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五年，这个公司的业务上发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九七〇年，这个公司还只与五十八个社队工厂发生业务关系，从这些社队厂收购的产品也只有八十三个品种。到一九七五年，却迅速上升到与二百家社队厂发生了业务关系，收购的产品上升到三百二十一个品种。在二百个社队厂中，除了二十三个厂是大工业扩散下放的外，其余一百七十七个社队厂都是这个公司一手帮助建立发展起来的。一九七五年，这些社队企业进货的总产值占了这个公司自行采购的商品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一。有些产品还是国内从来没有安排过生产的，如一百四十吨大铁滑车，二百吨千斤顶等，为国家市场填补了缺口，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商业部门，一无原材料，二无生产设备，三不掌握生产技术，凭什么去帮助发展社队厂的呢？这个公司的广大职工说得好：“我们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靠商业的桥梁作用去发展社队厂的。”

## 千方百计 穿针引线

商业部门是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它的特点是接触面广，“耳灵腿长”。事实证明，商业部门充分发挥这个特点来为社队工业穿针引线、架桥铺路，对于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来支援社队工业，有着巨大的作用。五金交电公司自行挂钩的一百七十七个工厂，每年需要的各种原材料，近二万吨左右，这些材料从哪里来？广大职工说，“从社会上找米下锅中来”。一九七〇年，这个公司专门成立了七个人的“社队工业材料组”，这个组同各批发部结合起来，在不与大工业争原材料的前提下，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挖掘社会物资潜力：

一、从工厂中挖掘废料。五金交电公司在与各工厂发生业务联系中，十分注意从这些工厂中挖掘废旧物资的潜力。他们从上百吨垃圾到一、二公斤的废料都收购。一九七四年，上钢一厂、上钢三厂有一批轧坏了的钢锭要处理，共有一万四千万吨。每块钢锭平均宽四尺，长五尺，重六吨左右。当时五金交电公司扶植的一些社队厂正缺乏原材料，有些商品，如铅丝、元钉，市场供应又十分紧张。可是要把这巨大的钢锭轧成制造铅丝、元钉用的线材，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要不要接呢？为了扶植社队厂上马，公司党委决定啃下这块窝窝头。没有堆放这些钢锭的仓库，就到机场、部队仓库、县、公社去联系空地。没有汽车运输力量，就到运输公司去求援。没有把钢锭割成小块材料的开割队伍，他们就到社队厂去组织人民公社的开割队。上海轧钢厂生产紧张，他们就组织到邻近省市中小型钢厂去轧材。经过两年多奋战，终于把这些钢锭变成了线材和其他各种小五金产品的原材料，解决了近二百家社队厂将近一年的生产各种五金产品的原料，并使这些小商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

二、参加外地和本市物资部门召开的金属材料调剂会。在调剂会上有些单位不需要的多余材料，他们就拿来支援社队企业。一九七四年，奉贤江海公社生产千斤顶急需无缝钢管。在调剂会结束后，上海采矿机械厂正好有十几吨废钢管要处理，五金交电公司就拿去支援了江海社办厂。

三、利用废旧物资公司的边角、角料、废料。几年来，他们坚持每个月到上海各区废旧物资公司的垃圾中去拣钢材的边角废料，每年解决社队厂近二千吨的各种钢材。青浦县西岑公社西岑五金厂生产的拎包上的半元圈，就是五金交电公司到废旧物资公司去收购的打包铅丝的断头给这个厂作原料的。

这个公司不仅在原材料方面为社队工厂穿好针、引好线，还从设备到技术，从图纸到模子，千方百计为社队厂架好桥梁。这个公司布点的奉贤庄行农机厂生产的二百吨千斤顶，贫下中农不仅从来没造过，甚至连看也没看到过。他们不懂技术，这个公司的采购员就组织他们到南京第二机械厂去实习。没有模具，他们就请上海橡胶厂帮助开模；缺乏设备，他们又四处奔走帮助找协作厂。在他们的努力下，二百吨千斤顶没有多久就在社办厂诞生了。现在年产量达到三百多台。

对已经办起来的社队厂，他们还注意通过穿针引线使它进一步巩固、提高。青浦县有三家生产箱子零件的厂，三家厂产品相同，但技术有高低，质量有好坏，差距很大。其中香花公社一九七三年正品率只有百分之四十，而解放公社的正品率则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负责收购这个产品的日用五金配件商店的采购员，组织三个厂召开了工商联合批林批孔大会。会议结束后，又组织三个厂成立了互助组，开展技术交流。城东、香花公社到解放公社一学习，正品率迅速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左右。三厂互助组成立后，还充分利用了三个厂的设备，推动了三个厂技术革新的开展。香花公社有轧钢设备，

生产能力有多余；而城东、解放却没有，过去轧钢都要运到市区来。城东公社有回炉设备，其他二个公社却没有，而城东公社生产能力又有多余。解放公社有装配箱锁的专用设备，而城东、香花却靠手工。通过互助活动，现在三个厂互相取长补短，轧钢、回炉再也不用到市区来，而且城东、香花通过向解放学习，装锁这道工序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此外，这个公司还通过组织现场交流会、取经会、专业工人互助组、流动展览会等多种形式，千方百计提高社队工厂的经营管理水平，并帮助端正经营方向。

由于我国还存在着商品制度，在穿针引线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受资产风的影响。这个公司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十分注意提高警惕。他们不轻易到社队厂吃饭，回市区时不带农副产品，有的采购员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每次下乡都是自己带上馒头和干粮，受到了贫下中农的表扬。

## 支农要支穷

支农要支穷。为社队工业铺路搭桥，重点应该放在穷社穷队上。五金交电公司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开始，他们并不注意这个问题，后来通过调查研究，他们认识到：对社队工业的支持，不能光是为了自己商业工作的需要，还必须努力去壮大公社、大队两级经济，为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作出贡献。如果在支持社队工厂中，光把眼睛盯着富社富队，那就不利于缩小、反而是在扩大农村集体经济之间的差别。从一九七〇年起，公司党委给各个业务部门、基层单位定下了一条原则：发展社队工业一定要到穷的地方去，一定要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去。因此，这个公司自行挂钩扶植的一百七十七个工厂中，多数是穷社和穷队。

五金交电公司在帮助穷社穷队发展社队工厂中，坚持穷棒子精神，使这些社队尽量做到“少花钱，多办事”。香花公社马铁厂在建厂时造了一个近二百平方米的食堂，公司采购员知道后，就带领这个公社的干部群众去川沙县顾路公社马铁厂参观。这个厂为国家作了很大贡献，但至今仍没有一个象样的食堂。香花公社的干部群众看了很感动，他们说：“我们是个穷公社，更应节约。”回厂后，他们就把食堂改成了车间。

在帮助穷社穷队上马的过程中，有些厂往往投资大，基建时间长，工人掌握生产技术也有个从不熟练到熟练的过程，为了不使这些穷社穷队负担过重，五金交电公司还采取了用一些技术简单、上马快、利润大、小批量的产品来养这些一时难以立即上马的社队厂。等到这些穷社穷队有了较高技术和利润后，再收回这些产品。青浦新桥公社是个穷社，公司决定在这里布一个生产马铁零件的工厂。这种厂基建时间长，投资也大。公司在建厂开始的一年中，给他们安排了一批利润大、技术简单的法兰盘加工产品，这样就极大地减



轻了这个穷社资金不足的困难，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

为了壮大穷大队的集体经济，公司还通过办“卫星工厂”的办法，来壮大公社和大队两级集体经济。松江县张泽公社原来安排了一个从翻砂到金加工的马铁零件厂，后来生产任务逐年增加，公社再发展下去有困难。公司看到这个公社的大队很穷，就提出把金加工扩散到大队去，公社集中力量搞翻砂，这样既能提高专业化生产程度，又能武装大队。公社同意这一做法，结果没有多久，这个公社的十五个大队，队队都办起了马铁零件金加工厂。

到穷社穷队去，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去，没有对贫下中农的深厚感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五金交电公司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说：“现在我们路越跑越远，厂越跑越小，点越跑越多，条件越跑越差，但我们的心里却越跑越甜。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了原来没有农机的地方有农机了，原来没有地下渠道的造起地下渠道来了，原来没有机耕路的现在铺起小公路来了。我们的路越走越直，越走越宽，心里当然越来越甜。”

## 在斗争中前进

五金交电公司的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建筑工人架桥要与大自然的风浪作斗争，为社队工厂架桥就要与修正主义斗，与错误的思潮斗。”这是他们支援发展社队工业的一条深刻体会。

五金交电公司支援社队工业的工作曾经遇到过一些干扰：有人说五金交电公司把全民所有制的资金流到集体所有制中去了，是在搞“资本主义”。有人指责五金交电公司为社队工厂架桥是“黑路子”、“乱胡搞”、“瞎布点”。但是，五金交电公司广大干部和群众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支援农业、关于发展集体经济的亲切教导，决心沿着这条路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同时，这个公司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年年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自己扶植的社队工厂的产、供、销和积累使用等各种问题进行调查。通过调查，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支援社队工业的自觉性。一九七四年，建筑材料批发部在马铁零件生产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华丰钢铁厂原来是上海生产马铁零件的基地，一九七〇年后开始生产汽车、拖拉机配件，马铁零件比一九六六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市场需要却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供需矛盾十分尖锐。一九七〇年我们分别在上海郊区布了五个生产马铁零件的社队厂，市场供应迅速得到缓和，有力地支援了华丰向高、精、尖方向发展。事实证明，我们为社队厂架桥不是黑路子，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正路子。”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五金交电公司广大职工在斗争中为支援社队工业架起了越来越多的桥梁，支农工作也越搞越出色。一九七〇年以来，这个公司一直是上海市的支农先进单位之一。

# 穿针引线 大有可为

##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如何当好发展社队工业促进派的讨论会纪要

七月十六日，上海市财政局党委召集部分区、县办事处的负责人、信贷员和四个分局的部分财税专管员，讨论了如何当好发展社队工业促进派的问题。现将座谈内容整理如下：

沈来法(川沙县北蔡银行营业所负责人)：

发展社队工业，可以更好地在资金和技术上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拿我联系的川沙县北蔡公社御桥大队来说，这个大队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十一个生产队欠过银行贷款，大队穷得连写大幅标语的纸张也要借钱去买。一九七一年三月，我们银行营业所的同志向御桥大队党支部提出了发展队办工业的建议，并同市区的信贷员广泛联系，帮助这个大队到上海自行车三厂承接一项拉丝的加工任务，办起了一个拉丝厂。四年以来，这个厂共为大队积累了资金六十万元。大队依靠自己的力量陆续购买了中型拖拉机二台，手扶拖拉机十台，插秧机、拔秧机各十二台，收割机八台，开沟犁四台，机动喷雾机九台，高压水泵十二台，吸泥吸粪泵九台，十三、十五吨拖轮二艘，以及饲料加工、切割、扬谷等农机三十二台。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五年，御桥大队比一九七四年粮食

增产六万多斤。今年夏粮又比去年增产近七万斤。从一九七二年起，各生产队就不再需要向银行贷款。到了一九七三年，所有历年积欠的贷款都已全部还清。

曹大璋(人民银行徐汇区办事处信贷组负责人)：

金山县亭新公社新兴大队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个大队原来也是个穷大队，分配收入每工五角左右，大队收入每年二十万元左右。一九七四年，金山县支行的同志到我们区来联系，询问有什么工业加工任务可以给他们办个队办厂。当时正在推广用塑料王来代替钢材，我们就同金山县的信贷员一起穿针引线，铺路搭桥，帮助这个大队搞了个塑料王加工厂，去年产值七万多元，利润二万多元，今年产值可以达十五到二十万元。这类社队工厂在支持大工业上有一些特点：(1)生产灵活，喊得应。塑料王是新型化工原料，过去加工单位很少，而且品种多，批量少，大型塑料化工厂很难适应。新兴大队的小工厂比较灵活，大小任

务都接受；交货迅速。今年三十万吨合成氨设备要上马，需要二台高速泵。但氨水在零下三十三度，高速泵转速一万多转的情况下，用一般材料做的高压密封垫圈很容易变形漏水。因此，我们推荐用塑料王制造密封垫圈，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新兴大队。他们加班开模子和压制，四天就保质保量地交了货，真是小企业解决了大问题。

(2)成本低，费用省。象化工局机泵厂生产的十立方米空压机，每台每年约需套子一千多只。国营厂生产这种套子每只一元，新兴大队生产每只只要四角一分。同时，社队办工厂按小、土、群的原则发展，投资小，收效快，有利于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象新兴大队的这个塑料王加工厂，就是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办起来的。一只土设备烧结炉，只花了一千元左右，如果搞一只标准炉，就至少得要八千元。

我们对发展社队工业意义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起初并不是很自觉的。过去，我们总以为促进农机、化肥等产品的增产，才是银行支农的主要任务。至于银行去支持社队办工厂，会不会挤占农业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算不算把全民所有制的利润、资金转移到集体所有制去，实在有点吃不准。因此，在行动上往往只是信贷工作上碰到工业部门需要加工部件或产品时，我们才到农村去找加工对象，并且总是光从图方便出发，只对路近、运输方便的富社、富队有兴趣。最近我们去青浦县蒸淀公社联系办工厂问题，那是个远郊的穷社，公社干部说：“你们这回可是来雪中送炭了！”我们听了感到很惭愧。今后，我们信贷员一定

要努力做好穿针引线的工作，在发展社队工业中起到应起的作用。

王玉春（人民银行杨浦区办事处信贷组负责人）：

我们过去认为，城市信贷的任务主要是促进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支农工作主要是县支行的事。文化大革命以来，通过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广大信贷员跳出了单纯资金观点的小圈子，努力使城市信贷工作为农业服务。信贷工作联系面广，对大工业有什么缺口，有什么下脚边料可利用，什么厂有废旧设备等情况，都比较熟悉。我们就利用这个特点，为一些社队挂钩搭桥，帮助发展社队工业。比如，上海汽水厂厂的淀粉下脚没有充分利用，我们就帮助南汇县祝桥公社副业场办了一个白酒厂。办酒厂必须要有蒸馏锅，我们又从高桥化工厂的报废堆中找到了一只旧的，修理一下就可用了。现在该厂每月生产白酒三万斤，每月净收入一万多元，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粮食。最近我们初步排排队，又发现了十几个项目。比如上海卷烟厂有很多烟末和地脚烟，香烟不能做了，但可以通过社队工业的加工制成烟丝和高效低毒农药。烟末加工成烟丝，可为卷烟厂增加一万二千担原料，增产一万箱香烟，等于三千亩烟田的产量。又如第四制药厂生产抗菌素有很多下脚毛粉，制人用药品已不行，但可以制成兽用药，至少又可帮助一个大队办个小工厂。实践证明，城市信贷对支援社队企业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大有可为。

郭强（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信贷组信贷员）：

我们认为支援总是相互的。城市支援了农村，反过来，农村也支援了城市。我们黄浦区有个红卫棉纺厂是生产“无纺布”的。无纺布有个原料叫甲壳质，由不能上市的“变质蟹”的蟹壳做成，原来是由外地供应的。今年一月到四月，供应脱节，使用部门只能用好的棉布代替无纺布，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其实，我们上海本地“变质蟹”的蟹源每年也有近千吨。最近，我们与南汇县支行一起，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在泥城公社塘角大队搞加工生产甲壳质，如果水产部门予以支持，无纺布的原料缺口是可以解决的。拿商业来说，情况也是这样。黄浦区丝吐商店专门经营各种强力丝和锦纶丝的下脚，我们商业信贷员配合松江县支行，为松江县泖港公社胡光大队办了个袜厂，用这些下脚生产土锦纶袜，价廉物美，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裘建时（市财政局第二分局业务一组副组长）：

把一些简易的产品下放到社队工业，大工业就可以腾出厂房、设备、劳动力，搞一些高精尖的产品。就拿我们分局对口的仪表电讯工业来说，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产值增长了四倍，劳力已经很紧张，再要抽出劳力去搞高精尖的产品困难很多。这几年来，他们把部分普通产品，如电话机、交换机、民用灯泡等项目下放到了社队企业，这个矛盾就缓和得多了。现在这个局产值年年上升，新产品也不断增长。

徐建新（市财政局第一分局电器行业组专管员）：

大工业把一些比较简单的产品下放给社队工业去搞，并把利润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这是不会涉及到什么资金、利润的转移的。社办工业的产品，大多是大工业的缺口产品，起接替、辅助、补充的作用，而且社队工业用来生产的设备，不少是市区有些企业单位闲搁在仓库里的废旧设备，是化废为宝。

李永根（人民银行普陀区办事处信贷组纺织组信贷员）：

在发展社队工业的过程中，确实有不少单位存在着资本主义倾向。比如，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虚报工时、抬高工价等手段，非法牟取暴利；或者把生产资料作为筹码，谋取个人的私利；或者行贿舞弊，搞不正当的物物交换。但是，决不能造成这样的错觉，好象社队工业就是搞资本主义的。其实，资本主义倾向并不是社队工业所固有的。有资本主义活动，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规律的反映。不发展社队工业的地方，不是照样也有资本主义在活动吗！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混淆不清，往往把限制资本主义的活动变成了限制社队工业的发展。一听到社队工业就好象要烫痛他的手似的，巴不得离得远一些。这是不对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当然必须坚决地斗争。然而那毕竟是少数，是支流，我们要看到主流、本质的东西，从而满腔热情地、满怀信心地去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我们要限制的是在发展社队工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要打击的是资本主义

倾向,决不是限制社队工业本身。

李其荣(嘉定县财政局党委书记):

社队工业同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它的成长过程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社队工业发展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矛盾,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反映。我们财政银行部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同时也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帮助社队工业健康地发展。我们局里有些同志前几年对帮助发展社队工业有“四难”思想,即“辰光未到难促进,业务不熟难帮助,面广量大难搞好,情况复杂难处理”。后来,经过认真的学习讨论,把“四难”换成“四心”,即:碰到钉子不灰心,学习业务有决心,面广量大有信心,情况复杂有耐心。大家都表示,我们要当发展社队工业的促进派,决不做挡风墙。

近几年来,我们重视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给社队工业以资金上的援助。经县委批准,每年根据地方财力安排一部分资金,以无息贷款的形式支持一些公社大队发展社队工业。二是集中力量帮助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社队发展工业。同时,提倡基础好的社队帮助基础差的社队,公社工业扶助大队工业,总结推广了南翔公社组织基础差的几个大队搞联合工厂,促进大队之间均衡发展的经验。到目前为止,全县已有五十四个大队建立了二十个联办工厂。这些厂年产值达六百三十八万元,积累一百三十七万元,平均每个参加联办的大队每年可以获得积累二万五千元左右。三是加强社队企业的经营管理。我们

一方面发动群众,在社队工业中间开展清查库,弄清家底,并帮助社队培训企业财会人员。在全县实行财会上“五统一”(即统一账册、会计科目、核算方案,报表、财务制度),相应地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企业财务物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对社队工业的利润积累、劳动工资以及购买物资等实行了三个管理,即:对社队工业的积累使用实行了计划管理,对企业务工社员的劳动报酬实行工资基金管理,对市外采购物资的资金往来实行了结算管理。通过这些工作与管理的落实,帮助社队工业端正了经营的方向,改善了财务和物资的管理,巩固发展了集体经济。

张松涛(市财政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有人编了几句顺口溜,说什么同社队工业打交道是千山万水(跑得远),千难万险(困难多),千辛万苦,最后落得千丝万缕(关系复杂化)。这些同志不想一想,干革命怎么会没有困难,为人民服务哪能怕千辛万苦!

戴仲嘉(分行营业部信贷科负责人):

这说明,我们财政、银行的同志要当好发展社队工业的促进派,还有不少思想问题要解决。思想不解放,行动上势必缩手缩脚。但是,只要我们广大的信贷员、专管员提高认识,充分利用我们财政银行的有利条件,为发展社队工业穿针引线,促进社队工业的发展,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做发展社队工业的热心人和促进派。

## 为什么会“重整车，轻配件”

上海货车制造厂工人理论小组

上海工业玻璃五厂关于茶盘生产任务一场争论的信，读了很受教育。在我们厂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争论。

以三十二吨矿用自卸重型载重汽车为例。这种矿区迫切需要的重型汽车，过去由于刘少奇崇洋媚外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长期依赖进口。外国资本家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欺侮我国不能生产，用拒绝供应零件的卑劣手法来卡我们。结果，有一个时期，矿区的许多进口车由于零件坏了供不上，动弹不得，成了几堆废铁，严重拖了矿区生产的后腿。一九六九年，我们厂的广大职工在兄弟单位的支援下，自力更生地造出了“争气车”，支援了矿业生产。但是，三十二吨载重车正式投产以后，产量年年增加，零配件却增加很少。一九七四年，有个八八六矿因为国产重型车配件供应不上，使部分车辆睡大觉。当时，我们有人到矿区访问，亲眼看到了这个情况，矿区的同志也迫切要求供应零件，他们说：“过去你们造‘争气车’，支援我们‘大打矿山之仗’，狠狠打击了帝、修、反。现在你们供应零件少了，却又拖了我们矿业生产的后腿。”这件事在我们全厂职工中震动很大。我们工人理论小组对厂里零配件生产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确实存在重整车、轻配件的现象。一九七四年有一种载重车，产量增长百分之二十六，零配件却只增长百分之

一。

为什么会有重整车、轻配件的问题？还是产值挂帅的结果。在我们厂，同样一辆三十二吨载重车的全套零件，如果装配成整车（把兄弟厂制造的发动机、轮胎等协作件的产值计算在内），产值就要比按一件一件的零件计算大十多倍。因此，当有些同志提出要把车间里准备装配的二十辆整车的全部零件送去支援矿区时，少数同志包括上级机关个别同志都不同意，他们说：“完成产值登报纸，完不成产值‘刮胡子’。已经到手的产值白白送掉，岂不是自讨苦吃？”两种意见就在厂里展开了争论。

这场争论的性质同工业玻璃五厂的茶盘生产问题完全一样，还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争论中，我们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算账有两种算法。光算本单位如何完成产值计划，是一种算法。但我们更需要另一种算法，即算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大账，算全局账。我们造重型车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矿区发展生产的需要，重型车造得多，矿区可以用来开采的矿石就多，就可以为钢铁等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辆上去

了,就能多造船,多造车,多造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各种产品。我们算账首先就要算这笔账。把二十辆重型车的零件拿去支援矿区修配旧车,表面上看,国家似乎少了二十辆整车,我们厂完成的产量计划也少了二十辆。但是,从实际经济效果看,把二十辆车的零件送到矿区,用来修配旧车,所能发挥的装运能力,就决不止二十辆,而是几百辆。几百辆的重型车开动起来,使矿区增加的产量、产值,以及钢厂因得到更多矿石原料而增加的产量、产值,比起我们一个厂来,又不知道要高上多少倍。

通过这样的争论,大家统一了思想,于是,高高兴兴地把二十辆车的零件送往矿区。同时,我们厂还对一九七五年各种载重车零配件生产作了重新安排,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这一年整车产量也增加了,全年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通过这样的争论,大家对坚持社会主义办企业的方向也更明确、更坚定了。许多同志说,产值挂帅,只顾片面追求产值,不顾国家建设需要,就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一种表现。我们一定要批判。

产值挂帅的原因很多,问题表现在基层,而如果上级机关有些同志有产值挂帅思想,对下面影响就很大。例如:有些上级机关在考核企业的生产成绩的时候,只抓一个产值指标,把是否完成产值指标作为判断一个企业的生产工作是否先进的主要标准,不作全面分析,就是助长产值挂帅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报纸、刊物的宣传报道,也要注意克服和防止这种片面性。

## 为人民服务是 社会主义商业的出发点

豫园商场革命委员会

工业玻璃五厂提出的问题确实发人深思。在商业领域,这样的斗争同样是存在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商业单位是单纯为了追求利润,还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同样决定着企业的性质。

我们商场主要是经营日用小商品的。全商场九十四个商店,每天接待着十万多人次的顾客,供应近一万种日用小商品和土特产品。但是,怎样经营小商品,从来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

线竭力鼓吹让封资修的糟粕占领我们商场，妄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场退回到解放前的城隍庙市场那条老路上去，为地主资本家的遗老遗少们服务。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冲刷了污泥浊水，使社会主义商场重新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是，斗争仍有反复。修正主义那一套利润挂帅的影响还会经常在我们商场内部反映出来。有的同志认为，“小商品吃力不赚钱，大商品赚钱不吃力”，总想扩大经营大商品，增加营业额，提高利润。这种思想一抬头，社会主义经营方向就会偏离，经营小商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积极性就会被抑制。一九七二年前后，我们商场里的日用瓶塞商店发生的一次反复，就是一个例子。日用瓶塞商店是大跃进中创立的，几年来，各种大小规格的木塞、橡皮塞、塑料塞，发展到一百多种。虽然消费者称便，但是有些同志却说：“小小瓶塞，两分一只，营业额低煞，利润少煞，资金捆煞。”为了增加营业额，一度把瓶塞商店的铺面腾出一半经营雨伞。一把雨伞几元钱，抵得上几百只小瓶塞。他们满以为有了这锅“营养汤”，瓶塞商店的营业额和利润就可以成倍提高了。可是，事与愿违，不仅营业额没有上去，而且由于瓶塞的品种规格减少，消费者在这方面的需要也往往得不到满足。这个商店的职工眼看着消费者因为配不到瓶塞而显露出来的那种失望情景，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心里十分难过。他们尖锐地批评领导：“我们推走的不是几个顾客，几笔买卖，而是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

从这件事中，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办社会主义商业，当然需要不断扩大营业额，并且努力为国家积累资金。但是，那只能是在社会主义方向上满足人民需要的结果。如果离开了这个方向，不择手段地扩大营业额，增加利润，“不管白猫、黑猫”，那就跟资本主义商店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商场岂不要回到过去的城隍庙市场去了？我们只有把路线端正了，才能为社会主义真正做出成绩来。于是，我们重新恢复了这个商店各种瓶塞的经营规模，而且依靠全体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努力做到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就经营什么。例如，有个顾客要配热水袋上的塞子，能不能因为我们只经营瓶塞，就把这位顾客推出去了事？不能！可是，哪里去找货源呢？批发部是没有这种现成货的。营业员同志决定自己到工厂去。对于工厂来说，单独购买热水袋塞子，过去也未曾有。但是，我们是搞社会主义，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经过日用瓶塞商店同志的宣传，工厂也十分支持我们，同意供应一批热水袋塞子和橡皮垫圈。从此，日用瓶塞商店经营的品种多起来了，商店职工开辟新货源的积极性也更高了。有一次，废品公司有一批报废的橡胶瓶塞要回炉处理，商店职工征得对方同意，派人去从成十万、成百万的废瓶塞中挑选出可以利用的瓶塞；运回来以后，又用滚烫的肥皂水进行清洗消毒。商店的职工说得好：“瓶塞虽小，价值虽少，但是经营小商品为人民服务的天地是无限广阔的。”他们提出：“一只瓶塞一颗心，一心想着工农兵。”经营的瓶塞、瓶盖已从一九六六年的一百多种品种规格，扩大到十四个大类、三百多种品种规格，营业额也从一九六六年的一万九千元，增加到九万元，每年上缴国家的积累达一万多元。

几年来，我们依靠广大职工，通过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工农兵服务，办好社会主义商业的决心更加坚定了。现在，全商场经营的小商品品



种,同一九七二年相比,已经从四千九百多种增加到将近一万种,营业额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上缴利润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这个事实说明,那种认为经营了小商品,就不能完成营业额和利润指标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要办好社会主义商业,不仅要坚持正确的经营方向,而且还要使商品的供应做到更加合理,让人民能够得到更多的方便,使资本主义得不到可乘之隙。

在我们商场的光明缝纫用品商店,曾经发生过这样两件事:一个老妈妈为了钉一个钮扣,要买一支丝线。丝线一支起售,是商业多年沿袭下来的老规矩。可是,一支丝线有一、二丈,钉只钮子只需要尺把长,多余下来的丝线不是浪费了吗?消费者不是多花了钱吗?于是,这个商店就打破老规矩,实行丝线零根出售,一分钱可以买两根丝线。丝线颜色有一百多种,经营这种东西的商店就象个中药铺,要从一百多个品种里,挑出顾客需要的颜色来,本来已经是够麻烦的了,现在又增添了折零,更要忙上加忙。但是为了便利消费者,他们还是坚持这样做了。当然,他们也不是对所有来柜台前的顾客都给予方便。这要作阶级分析。比如有一次,几个顾客要买几十盒各种颜色的丝线。一盒有五十支,买这么多的丝线干什么呢?即使是北方农村,绣床沿、帐沿要用的丝线,一、两盒也就尽够的了,决不会象现在这几个顾客那样,需要这么多的数量,而且什么颜色都要。果然,经过查问,发现这几个顾客是搞长途贩卖的。他们就坚决抵制,拒绝供应。这两个事例告诉我们:凡是对人民生活能够带来方便的,即使再细小、再麻烦的事情,也要积极去做,而且要努力办好。现在,仅小五金商品拆零供应的就有七十多种,有的花一分钱还可买两种商品,袜子也可单只配双。但是,凡是发现有可能给资本主义活动提供条件的漏洞,就坚决不做。社会主义商业就是要这样旗帜鲜明地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几年来的斗争实践还告诉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商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三尺柜台,而是必须过问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通过我们的本职工作,去努力占领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小商品往往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最容易借以活动的温床。几年前,在商场附近就有人设摊兜售一些充满封建糟粕的绣花枕套和拖鞋纸样。对于社会上这样一类现象,我们该不该去管呢?不仅要管,而且这件事情的本身,也说明正是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商业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方面没有搞好,这才被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钻了空子。为了占领这块社会主义阵地,商场职工立即动手描印了一批绣花纸样,在光明缝纫用品商店出售。第一批上柜五百张,当天就卖光了。后来,我们根据群众实际需要,专门开设了一个经营枕头、台布、童装的绣花纸样以及各种服装裁剪纸样和鞋样的“出新纸样商店”。以后,这家商店的职工,还用一部手推车把纸样推到别的地方去流动设摊,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阵地,为工农兵提供更多的方便。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批判营业额挂帅、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路线,小商品市场是大有可为的。我们有充分信心,不断改正缺点和错误,依靠广大职工群众,把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做得更好。

# 努力做发展生产的促进派

上海市财政局第三分局小分队

我们做财政工作，要促使工厂完成纳税和上缴利润任务，厂里生产的产品产值高、利润高，税收和上缴利润也就多；反之就少。因此，我们也十分关心工厂完成产值和利润指标的情况。去年，我们遇到这样一件事：我们负责联系的上海焦化厂第四车间的工人、技术员，在上海化工学院的协助下，于一九七一年利用废酸试制成功的重要制药原料——噻吩，经过三年时间试生产，决定扩大能力，正式投入生产。要扩大生产，就得采购必要的设备，修建一些房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资金。他们问，银行能不能贷一笔款？当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噻吩产量每年不过几百公斤，扩大生产后也不过几千公斤，同这个厂主要产品的产值相比，不过是几千分之一。要为此个零头产品贷放上百万元的资金，值得吗？何况从当时噻吩的生产情况来看，又有一定亏损，把资金用到亏损产品上去，将来能不能收回还成问题，这不是要冒风险吗？我们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产值挂帅、利润挂帅，根据产值、利润大小决定是否贷款以及贷款多少，而不管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具体表现。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套是不能再干了。但是我们财政工作要为国家积累资金，不算经济效果，盲目贷放国家资金，也是不对的。怎样正确处理这个矛盾，我们还是在到了工人群众中去以后，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才得到答案的。

工人群众在试制噻吩的过程中，为什么能够发挥出那么大的革命干劲？我们了解到，噻吩是制造退热特效药——先锋霉素的重要原料。过去，帝国主义国家欺侮我们不能生产，就用拒绝供应和抬高价格等手法来卡我们。当我们试制成功噻吩，并且由药厂加工出先锋霉素以后，外国资本家又污蔑我们是在进口药品上贴国产商标。现在，中国工人阶级决心制造这一争气产品，难道能说是单纯的生产仗吗？这是一场同帝、修、反作斗争的政治仗。同时，工人也以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态度，认真计算产值和利润账。他们不仅努力节约消耗，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善于算大账，算全局账；几百公斤噻吩，产值少，在试制阶段还有亏损，但拿到制药厂加工制成先锋霉素，每年就是二、三百万元的产值和一百多万元的上缴利润。至于这个产品在卫生战线上发挥救死扶伤的巨大作用，就更不用说了。毛主席早就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我们的经济政策》）原来，我们只在一个企业里算小账，只看到新产品在眼前的试制阶段存在亏损，就怕冒风险，不敢贷款，这正是十足的目光短浅，是毛主席批判的在单纯的财

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我们从工人群众中学会了用全局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算账，认识就很快统一了。经请示领导同意，决定为扩大生产嗷吩购置设备，贷给这个厂一笔资金。

贷款发放下去后，我们作为财政专管员的工作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但是，工厂拿到了资金以后，工作还仅仅是开始。特别是他们发扬“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争分夺秒地要提前实现计划，而某些设备，从订购到交货总要有一段时间，这就发生了一些困难。对这些困难，我们是插手进去还是袖手不管？

分工如分家，隔行如隔山，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财政专管员只管监督工厂执行财务制度，按时足额纳税和上缴利润。发现生产中的问题，也只是向上反映一下。在有些人看来，只有这样进行工作，才符合规矩，是正业；而别的事情，根本用不着我们去管，如去做了，就是不务正业。这种陈旧的保守的财政观点，老爷式办财政的坏作风，严重损害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毛主席在三十三年前就明确指出：“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这就是说，做好财政工作，首先要着眼于发展生产，做发展生产的促进派。根据我们财政工作联系面广，每个工厂都有财政专管员的有利条件，正可以帮助工厂提供线索，做好架桥铺路的工作。我们通过其他工厂的财政专管员，了解到一些急需的设备，正好在工厂仓库里有存货，就把线索告诉了焦化厂，通过正常手续进行了调拨。这样，焦化厂生产嗷吩所必需的设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解决，使新产品投产计划能够顺利实现。现在，嗷吩正式投产还不过四个月时间，月产量就已达到了设计水平。由于工人群众积极挖掘潜力，降低消耗，生产成本比原来下降百分之八十，使嗷吩生产转亏为盈。从目前生产的情况来看，不要两年时间，就可以从上缴利润中收回全部贷款。

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工作的时候，深深地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同样在工厂做财政专管员，无非是跑跑工厂的财务部门，翻翻账册报表，拔拔算盘。依靠这样的工作方法，我们的工作就决不会象今天这样，取得工人群众的支持。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在促进生产发展上做出一些成绩，就是因为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同劳动，并且在劳动中接受工人群众的再教育。总结这几年的工作，可以这样说，财政工作要着眼于发展生产，不仅是工作方法的改变，而且首先是财政工作人员世界观的改变。没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就不能想工人群众所想，急工人群众所急。当我们深入到车间里去，看到工人为了搞出“争气产品”，打击帝、修、反，不避硫酸气体呛人，用坛坛罐罐土法上马，一直坚持到试验成功，我们怎么能撒手不管呢？当我们看到厂里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不分部门、工种，“份内事拚命干，份外事抢着干”，我们又怎么能死抱住自己的“正业”，不去帮助工人寻找设备和材料来源呢？嗷吩生产是工人群众对我们上的深刻的一课。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争当发展生产的促进派，努力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做好财政工作。

## “社会公仆”赞

——老根据地访问记之二

李长青

在春临潞江的时节，我访问了潞江边红色的山乡——兴国县长冈乡。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英雄势。”著名法家词人陈亮的这个名句，恰好借来形容长冈的气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长冈乡，如今春满山头，绿满山头，人满山头，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这里的广大干部发扬当年长冈乡“真正模范的乡政府”的光荣传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学做“社会公仆”。

在我下榻的招待所里，有一位女服务员，二十出头年纪，矮墩墩的，挺健壮。我问她是哪里人。她用清亮的嗓音回答说：“俺（我）是长冈人！”话音里带着明显的自豪。

是的，怎么能不自豪呢？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主席亲自来到长冈乡作调查。第二年一月，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光辉著作里表彰长冈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从那时候起，长冈的模范作风就成为我们党优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象传家宝一样，代代相传，在斗争中永远熠熠生辉。

我正想了解长冈，就要她多谈一些关于长冈乡的情况。她告诉我，出东门，渡潞水，就是长冈，一共四个村子，现在是长冈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当年，毛主席走遍了长冈乡，亲自向老贫农、红军家属、村代表主任等等作了详尽而周密的调查。毛主席在长冈乡，平易近人，对群众十分亲切，老人们全记得清清楚楚，都说：“毛委员同俺老百姓一个样，一点架子也没有，真是俺自己的领头人。”老人们还说，当年的苏区干部，听毛主席的话，作风可好哩！你要是去找这些老人，他们准会讲许多故事给你听。

女服务员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我。第二天一早，我就到长冈乡的新溪村去了。

事先，当地一位干部向我介绍，说新溪有一位老同志，知道许多关于长冈的事，特别是“彭国亮办粮”的事，他了解得最具体。我问明了这位老人的姓名，正要走时，他又补充了一句话：“这位老人热情健谈，是有名的‘三袋烟’。”我想问这绰号是什么意思，他却笑着说：“你见了就明白了。”

在新溪，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位老人。他听说我要了解彭国亮办粮的事，很高兴，就一边装着早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

“彭国亮同志办粮这件事，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光辉著作里，也表扬了哩！”

“那一年，碰到夏荒，群众的粮食发生了困难，乡政府决定到二百多里外的公略县去采办粮食。派谁去呢？彭国亮自告奋勇地说：‘这任务交给我吧！’他接受任务后，当天跑遍了全乡四个村子。”

“做啥呢？”我问。

“彭国亮做事从来不马马虎虎；他要亲自了解一下群众缺粮的情况。一了解，总共缺四百八十担粮食。”

“第二天一早，我在村头见到他。他右肩扛着一根扁担，左肩揹着一个竹饭筒，脚上穿了双细麻草鞋，腰里扎一条白布围巾，动身到公略县去。”

“这二百多里，尽是山路，可不好走哇！听说他一口气走了两天，就赶到了。在东固、路村、水南、富田等几个圩场上，花了半个月时间，好不容易买好了四百八十担米。接着他又亲自带领一百六十多个劳动力，分四次，把米挑了回来。”

“一进村哪，村里可热闹了，大人笑，小孩跳，都夸彭国亮办了件大好事。可是找彭国亮，却不见了。”

“他累病了？”我急急地问。

老人却不说话，只顾往烟斗里装着烟丝，擦根火柴，啾啾地吸起来。

我只得等着，心里计算，这是第一袋烟。

一会，老人又说了：

“原来，彭国亮一进村，有人告诉他，老贫农刘大焕害了重病。这可急坏了彭国亮，他连家也顾不得回去，先到了刘大焕家。”

“大焕看到彭国亮，可乐了，急忙把政府怎样关心他，为他治病的事讲给彭国亮听。彭国亮看到大焕的神情，才放了心。但又一想，大焕一病，大焕嫂不能下田，还要请帮工，粮食一定更困难了。怎么办？从大家的份内匀一些出来吗？不行！还是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他吧，宁可自己没粮吃，也不能把困难摊给群众。”

“说得好！”我感动地打断了老人的话，“这对那些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对群众的困难漠不关心，甚至利用职权损人利己、化公为私的少数人来说，是多好的一面镜子啊！”

“可是彭国亮回到家里，就遇到矛盾了。”老人说，“因为他家早就没有米吃，天天吃红薯丝煮野菜汤，听说彭国亮办米回来了，彭嫂正等米下锅呢，不料看到彭国亮空着手回家，心冷了半截，冲着丈夫就开‘火’：‘你还管不管家里的事？’”

“‘没米下锅，就不革命啦？’彭国亮笑嘻嘻地说着。彭嫂又开了一炮：‘锅里没米，疙（愁的意思）掉老命！’”

我着急地问：“那彭国亮怎么办呢？”

“彭国亮自有办法。你别急，等我抽袋烟，再慢慢说。”

第二袋烟抽完，老人笑咪咪地又说了下去：

“彭国亮见了老婆这副神气，噗哧一笑：‘真会疙掉老命？’

“彭嫂没好气地说：‘总没有自己饿着，拿粮食去填别人肚皮的。’

“‘怎么没有？’彭国亮神情严肃起来，‘你还记得，过去我们替地主干活，种出来的粮食，全归了地主，自己却挨饿。当然那是旧世道，但那种日子，却忘记不得。再说，在那时，你总是自己咽野菜，让我吃稠的。有了细大伯（对孩子的爱称），你也还是让我吃。这不也是自己饿着，拿粮食填别人肚皮？这种精神就很好嘛！’

“‘你不要给我戴高帽子（夸奖的意思），我不跟你这号蛮人讲。’

“彭国亮笑起来：‘我是个曼人（高个子的意思）？’他故意把蛮人说成‘曼人’，接着又说：‘你说起曼人，我倒有个曼人的故事要说给你听。’

“‘第三次反围剿时，我参加了担架队，队长是个高个子，大家喊他曼人队长。那时，粮食很困难，我们每人只有一点点干粮，都舍不得吃。’

“‘后来，发现有个小战士倒在路上，原来是饿晕的。担架队员都争着要拿干粮喂他，可是曼人队长把大家都推开，解下自己的干粮袋，把仅有的一点干粮一口一口地喂了小战士，然后饿着肚子走了五、六十里山路，把小战士送到了后方医院。’彭国亮讲到这里，有意问道：‘你看，那时是让担架队员们拿出干粮来呢，还是曼人队长自己拿出来呢？’

“彭嫂说：‘那当然应该曼人队长拿出干粮来。总不见得自己吃得饱饱的，让队员饿着。’

“彭国亮说：‘这就对了。我们应当向曼人队长学习，我们当干部的万万不能光为自己着想，要时时想到群众。象大焕叔有了困难，我们就要尽力帮助他。’

“彭嫂听到这里，说了声‘你呀！’就跑上楼去，倒了半筐红薯丝，走过彭国亮面前，有意重重地踩了他一脚，痛得彭国亮‘啾呀’叫出声来，彭嫂笑了，下命令似地说：‘走，磨粉去！’”

听到这里，我不禁高兴地笑起来，但马上又觉得不安了，问老人：“只有这半筐红薯丝，能磨多少粉？他全家的日子怎么过呢？”

“是困难哪！”老人收敛了笑容，默默地装着第三袋烟。看神情，他是想起了一件很沉重的事情，我不敢打扰，只是看着他。

“那时候，”老人拿着装好了烟丝的烟斗，没有擦火柴，又说了下去，“干部们出去开会，工作，都是自己带饭。彭国亮家里吃的是野菜红薯糊，他不愿意带这个去开会，让同志们替他不安，所以他什么吃的也不带。到了吃饭时候，就独自跑到河边喝凉水。次数多了，干部们渐渐有点发觉：为什么老彭每到吃饭时就不见人？是忘了带饭来？还是有什么难处呢？一位熟悉他的同志说，今年交军粮，全村数他交得最多，他全年打下一担粮，全交了出

来；交了粮不算，还把他老婆的手镯、耳环、围裙和种的辣椒、黄麻，都兑钱买了公债。象这样一位同志，有了困难也是决不肯说的。大家都说，下次要关心着他点。后来，又到区上开会。中午他照例躲着大家到河边去，一位区干部早就注意着他，一把将他‘捉’住了，埋怨他说：‘老彭，你有困难怎么不说？走，我带了饭，够我们两人吃的。’彭国亮却假装打着饱嗝说：‘饱了，吃不下了。’这位区干部看着彭国亮越来越瘦削下去的面庞，难过地说：‘老彭啊老彭，你对革命的这片心意，大家都了解，可是你也得顾着一点自己的身体啊！’彭国亮感激地回答说：‘请组织和同志们放心，我很好嘛！我只觉得，比起在前线流血牺牲的同志们来，自己为革命做得太少了。’这天开完会，彭国亮又累又饿，晕倒在回家去的山路上……”

说到这里，老人沉静了很久，没有说话。我心里也象有一股强大的泉流，汹涌奔突，不可抑制。多么值得崇敬的革命前辈啊！他们是这样珍惜人民对自己的信任，他们当了干部，比所有的群众都最多吃苦，又比所有的群众都最少得益，他们事事做群众的模范，从不要求丝毫特权，他们的确可以称之为彻底鄙弃了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尚的共产主义者！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的这种思想情操，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把它发扬光大呵！

晚上，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位同志来约我一同去访问另一位长冈老人。我们沿着黑黝黝的山梁走着。这时，远远近近的山路上，有不少象我们一样的夜行人，有的打着手电，忽闪忽闪，有的提着马灯，发出晕红的光。我的同伴深有感触地说：“看着这情景，就叫人回想起当年艰苦的战争岁月，那时候，老根据地的干部，白天和群众一样生产、支前，晚上就打着灯笼，挨家挨户地访问，把苏维埃政府的声音传到每个群众心窝窝里去。”接着，他就高声吟诵起一首民歌来：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  
夜打灯笼访贫农。”

他的富有感情的声调，好似把我也带进了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前线上响着炮火，干部们黑夜里还在奔忙。他们没有任何工资，“自带干粮去办公”；但他们的革命意志何等旺盛：“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他们把群众装在心里，他们是群众的贴心人。

我问身边的同伴：“当年的老干部，现在在本地还能见到吗？”

他说：“不多了。不少同志正在天南海北的许多领导岗位上，更多的同志已经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献身，不过他们留给我们的光荣传统，那是永远也不会磨灭的。今天晚上，我们就能知道一位模范干部的动人事迹。”

“他叫什么名字？”我急切地问。

“他叫黄源堃，是当年长冈乡党支部书记，早已牺牲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脚步却更加快了，转过一座山头，出现了一排亮着灯光的房屋，同伴

说：“到了！”

我们走进屋子，几位老人正等着我们，他们都是黄源堃同志的同代人。坐定以后，他们就详细地向我们介绍着黄源堃同志和群众心连心的故事。

党支部书记老黄热爱群众，时刻都把群众放在心上，谁家有什么困难，他就出现在谁家里，对红军家属，照应得尤其细心，他常说：“她们的亲人在前方杀敌人，我们理应在后方把她们照料好。”

车岭脑的刘长秀，丈夫和儿子都当红军去了，家里就她和小儿子冬生两个人。一年夏天，刘长秀得了心气痛的病，冬生又长了疮疖，这可急坏了老黄。一天清早，老黄到灵山岷背去采了草药，连早饭都没吃，就急忙送去。

老黄正走着，只见对面山坡上有个中年妇女，右手搀着个孩子，左手挎个篮子，弯着腰在挖野菜。“那不是刘长秀吗？”老黄加快了脚步，大声喊着：“大嫂，你在做嘛格？”

刘长秀一听，声音好熟，一抬头认出是老黄，便边走过来边问：“老黄到哪里去？”

：“我是来看望大嫂的。”

“你们当干部的，工作忙，还老惦着我们，真象亲人一样呢！”

老黄把草药交给刘长秀，并叮嘱说：“回去歇歇吧，别累着了。”老黄又一眼看到了篮里的野菜，就难过地说：“大嫂，你断了粮怎么也不吭一声？”

刘长秀把篮子移到身后，装出很轻松的样子说：“有粮食！搞点野菜也只是吃个新鲜。”说着，怕孩子插嘴，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了。

老黄回到乡政府，当即到互济会去支了一斗米，给刘长秀送去。

过了几天，是“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在苏区，每到这一天，所有的干部都自带干粮，带红军家属或“孤老户”去劳动。这一天，老黄带了乡干部，来到刘长秀家，有的打扫院子，有的挑水、劈柴。老黄看到她家窗户太小，房间里阳光不足，容易生病，就派人到乡政府拿来两个现成的大窗户，很快换了上去。刘长秀看到干部们忙得满身大汗，又感动又不安，只是喃喃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老黄一年到头，总是这样日不歇，夜不眠，走东村，跑西庄，每一家的事他都了如指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辛苦，他说：“我们当干部的，要把党的关怀带给群众，我们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

说得好啊！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桥梁”。而建筑这种桥梁的，正是象老黄这样无数优秀的干部，他们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把这看作自己无限崇高的职责。有了这样的“桥梁”，我们的党就和广大群众紧紧相连，就能形成一座无论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几位老人接着又谈到了群众当年万众一心地保护干部、拥护革命的动人情景。

有一次，长冈乡被敌人占领了，老黄为了掩护群众，不幸落在敌人手里。

这股敌人自从窜入革命根据地以来，连吃败仗，今天抓住了我们一个党支部书记，看



作是一个炫耀“胜利”的机会，敌团长就把全乡群众赶到一块空场上开大会。

老黄被敌人五花大绑，押进会场，他全身是伤，却依然目光炯炯，毫不气馁。群众看到自己的支书受了苦，心里都象刀子剜一样痛，但他们从老黄这坚毅的眼神里，又受到极大的鼓舞。

敌团长狡黠地说：

“这是你们的书记，大家都认得。如果有人出来保他，我们愿意宽大释放。愿意保他的，就站到左边去，嗯？”

话音刚落，哗！场上的群众都站到了左边，有人高喊：“我们全村保他！”

敌团长原以为没人敢出来担保，这样他就可以在老黄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肆意污蔑，没有料到竟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他好象挨了当头一棒，慌慌张张押了老黄就走。

敌人缩进了兴国城。长冈乡群众暗中商议，老黄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他和我们心连着心，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他们打听到了关押老黄的地方，又通过地下关系教育几个看押老黄的敌兵。一天深夜，几个精干的小伙子悄悄混进县城，爬过墙头，摸到了老黄身边，揩起他就走。几名敌兵经过教育，早已躲到一边去了，直到人已去远，他们才喊丢了人，而这时，老黄他们已经疾速地出了城。

敌人发觉根据地群众劫狱，几次到长冈来搜寻，群众把老黄严密掩护起来，今天藏在这家，明天又转移到那家，敌人处处扑空，连老黄的一根汗毛也摸不着。

敌人恼怒了。一天，把全村老百姓都扣了起来，威胁说再不把老黄交出来，全村老小就一个也不用想活了。

敌人的威胁，吓不倒同革命连着心的群众，他们谁都知道老黄隐蔽在自己村里，但谁也不肯说出他的下落，任凭敌人用皮鞭抽，用枪托打，打不出群众嘴里一个字！

正在这时候，兴国城郊突然响起了红军的喊杀声，原来毛主席指挥下的英勇红军打回来了。敌人见势不好，夹起尾巴仓皇逃跑。长冈群众立即奔到村后，把老黄从一个树洞里接了回来，他们流着泪欢喜地叫着：“老黄，我们胜利了！”

听老人们说到这里，我眼里的热泪再也忍不住，扑簌簌地流了下来。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我们的干部同群众的亲密关系，是建筑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上，在生死的斗争中形成的。有什么力量能战胜他们呢？没有。因为我们的干部真心实意地爱护群众，不做高踞于群众头上的老爷，而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结束访问后，我带着深深崇敬的心情，跨过架设在激江上的“红军桥”，告别了长冈。我站在桥头，思绪联翩。自从毛主席从这座桥上走过，四十多年来，有多少革命者踏着毛主席的脚印，去转战南北，他们把长冈乡干部的优秀作风，带向了全国。听，桥下水声汨汨，好似群众在对远征的子弟细声叮嘱，做社会公仆，做社会公仆；而这激江激流，又似在把长冈传统，播向远方，播向远方……。

# 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

杨 立 强

袁世凯是个臭名昭著的反面教员，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主要不是在于辛亥革命前的活动，而是辛亥革命后的疯狂复辟。

## “非袁莫属”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上，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了乌云层层夜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经过长期酝酿，终于爆发了。武昌的枪声一响，平日作威作福的清朝达官贵人，一个个吓得心惊胆裂。革命军已攻占武汉三镇，而清朝的总参谋部——军谘府却陷于瘫痪状态，高参们全都呆若木鸡，不知所措。经过两天策划，才勉强任命陆军大臣荫昌率两镇(师)陆军去湖北“剿办”。

十月十二日，军谘府正在开会。只见一个身穿长袍而脚上却穿着一双长统军用皮靴的人走进来。他就是陆军大臣荫昌。他刚一进门，屋里立时响起一片“恭喜”声，荫昌却半似谦恭半似玩笑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的“玩笑”，说出了清朝政府虚弱的本质。身为陆军大臣的荫昌，虽辖有十多万陆军，但作为主力的却是北洋六镇。六镇的头目段祺瑞、冯国璋等，个个都是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亲信。他们唯袁世凯之命是从，名义上归陆军部统辖，却并不听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政府调度。为了扑灭辛亥革命的烈火，帝国主义、国内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以及立宪派一类政治势力，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袁世凯。

袁世凯是清末封建买办的反革命武装政治集团——北洋军阀的头子。这个出生河南项城军阀世家的野心家，依靠一八九五年开始在小站练兵时培植起来的反革命武装，伪装赞助戊戌维新又出卖戊戌维新，用维新派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爬到反动统治的上层。又因疯狂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参加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东南互保”，深得帝国主义的赏识。随着权力的不断膨胀，袁世凯同清朝皇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一九〇八年初，摄政王载沣借口袁世凯有“足疾”，把他赶回原籍。但是，袁世凯有一支受他控制的北洋军队，有一帮子身居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要职的心腹、爪牙，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仍然是个中外瞩目的“强人”。

革命军一兴起，帝国主义分子就扬言：“如果清朝政府获得象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驻华外交使团公然推派美国公使为代表，向清朝政府提出起用袁世凯的要求。各种外文报刊大做“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甚至直言不讳地警告说：“除非清朝政府再次召袁世凯参与国事，没有任何行动能使清朝政府取得国内外的信任。”

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更纷纷要求起用袁世凯。他们说：“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可以延迟灭亡，或可不亡。”刚被撵下台的大买办盛宣怀，不记几年前受袁世凯排挤的旧怨，深有感慨地说，“事变至此，荫午楼（荫昌）奚能当之，非袁氏莫属”。他积极活动载沅请袁世凯出山，并主动给袁世凯出谋划策，劝他“亲临前敌，专力图鄂”。

张謇、汤化龙等立宪派也跟着起哄，称袁世凯是中国“最有声望”、“最有能力”的人，他们推动一些省的立宪机构——谘议局上书请愿，为袁世凯卷土重来帮腔。

就这样，“非袁莫属”、“非袁则亡”的叫嚣，成为中外反动派的时髦口号。

在中外反动派的鼓噪下，本来和袁世凯穿连裆裤的庆亲王、内阁总理奕劻，乘势敦促载沅从速起用袁世凯。他说：“以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袁世凯的亲信徐世昌等人则不断给载沅施加压力。走投无路的载沅，终于决定起用被他赶走的袁世凯。

袁世凯自己怎样呢？他回到河南后，装出一副寄情风月，“与世无争”的样子，不是同一些名士诗酒自娱，就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垂钓于洹水之上，到处传送他的“唱和集”和“渔照”，以迷惑对他不放心的人。然而，他家里特设的电报处，日夜收发不停，同各处的心腹保持密切联系，同各国使馆也电函交驰。朝内生波，京外报警，他无一不了如指掌。有一次，他在答复徐世昌请教政事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私房话”：“某今日所处地位，大类山中宰相，虽退隐犹与闻国事”。当革命军攻下武昌，袁世凯就立即认定“摄政王既少不更事，老庆又昏耄而无奠安大局之能力”。言外之意，非他袁某不行。但当载沅起用他为湖广总督时，他却称病拒不受命，还授意北洋部将“慢慢走，等等看”，以便见风使舵。袁世凯耍弄的是“一箭双雕”的把戏：利用革命党人的炮火，慑服载沅一伙亲贵，迫使他们交出全部权力；又准备好以手中的反革命武装对付革命，暂时支撑住清朝政府，向革命党人讨价。眼看就要完蛋了的清朝政府，为了苟延残喘，只得答应袁世凯的全部要求。十一月一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来京组阁。

这个药方果然灵验。袁世凯一接到命令，“难痊”的“足疾”立见康复，“咳嗽”也马上消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袁世凯内阁粉墨登场，把清朝政府的军政大权夺到手。他肩负着中外反动派的殷切期望，挥舞着时“剿”时“抚”、“战”“和”这把双头魔剑，来“收拾”革命党人了。

汤化龙和张謇一班立宪派，本来是清朝政府绞杀革命运动的帮凶。但是，在清末的假立宪中，他们同清朝政府原有过一段小狗与大狗、饿狗与饱狗之间的争斗，发泄过一些分不到残羹剩饭的奴才对主子的牢骚，现在有机可乘，就赶紧收起君主立宪的前朝旧调，改唱“共和”新曲，混进革命队伍内部进行投机、钻营。奸狡的袁世凯看透了这批人的心迹，施展他那纵横捭阖的手段，“诱以官、禄、德”，威以枪和炮，把他们拉了过去，成为袁世凯统

杀革命，篡权复辟的有力工具。

袁世凯一出山，就指使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攻占汉口。随后，却又要冯国璋暂时停止前进，暗中派人写信给黎元洪，提议停战，表示只要武昌方面放下武器，非但不咎既往，还能受到重用。

“和平”的信使往返，“停战”的命令频传。已经向袁世凯投降的革命党叛徒汪精卫，与袁世凯的心腹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提出即日停战，被袁世凯收买的报刊也大叫“授袁全权”，“和平解决”。这个“和平攻势”，只因“民军气焰方张”，黄兴等革命党人坚决拒和，一时未能得逞。

“拉”的一手失灵，袁世凯又恶狠狠地下令冯国璋挥兵进攻。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攻占了汉阳，在龟山架起大炮，隔江猛轰武昌，摆出随时渡江的姿态。

惊恐万状的黎元洪和各省先期抵达武昌的一些立宪党人，慌忙接受停战议和。

“和谈”正式开始。袁世凯的新阴谋又在酝酿着。

### “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唐绍仪带着袁世凯的密计，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达上海，同民军代表伍廷芳谈判。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伍廷芳很快就作出让步，提出只要袁世凯承认共和，逼清室退位，就可以举他为大总统。

这时，袁世凯已经看到“共和”是大势所趋。他决定接过“共和”的旗号，以武力为后盾，打乱孙中山的部署，撬掉清廷这块顽石，为自己最终夺权窃国铺平道路。十二月二十九日，他电告唐绍仪，即照伍廷芳的诺言达成协议。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建立一个全国的领导中心已经刻不容缓了。就在南北达成协议的那一天，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成立临时共和政府。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传来，袁世凯拍案而起，大骂这是违背协议，指使亲信电责唐绍仪。

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当天，唐绍仪“请辞”代表职务，通知伍廷芳“停止开议”；报刊上出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消息：北方撤销议和代表。

同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余人，联名通电，叫嚷：“若以少数人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帝国主义又一次同袁世凯紧密配合：列强的军舰在长江为袁世凯的讹诈助威，沙俄、日本的军队在东北张牙舞爪，冻结海关收入，在财政上扼制南京临时政府，各帝国主义报刊攻击孙中山是“恶毒的空想家”，搞“寡头政治”，并扬言只有袁世凯统一南北，它们才能承认民国。

在孙中山新建立的革命政权遭到中外反动派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的立宪派，再次在堡垒内部捣乱。汤化龙、张謇一伙迫不及待地投到袁世凯麾下，他们拉拢，纠集叛徒汪精卫和革命党里的投降派，恶毒攻击孙中山“贪恋禄位”，要求孙中山

下台、让位。身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不断向袁世凯暗通消息，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外有恶狼，内有蛀虫，孙中山只得声明一俟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政见，赞成共和，他就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临时大总统的地位得到保证，袁世凯洋洋得意，眼看是最后踢开清朝皇室的时候了。一月二十六日，不久前还在通电“誓死抵抗”共和政体的段祺瑞那班好汉，摇身一变又成了坚决“拥护”共和的英雄，不仅通电要求清朝皇室“立定共和政体”，而且还决心“率全体将士入京”，剿灭敢于反对共和的“败类”。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室退位的“诏书”送到了袁世凯的住宅——外交大楼。当晚，大楼不时传出阵阵异乎寻常的笑声。袁世凯双手抚摸着头上的辫子，对镜自赏。这条辫子在他头上晃动几十年了，他怎么舍得丢掉？如今，他要当“共和”的头儿了，又不能不顺着革命党。一想到退位“诏书”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临时政府”的话，不禁欣喜若狂，拿起剪刀，一边剪着辫子，一边哈哈大笑。

“袁世凯剪辫子了！”这条新闻一时轰动了北京城。

袁世凯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政见说：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

他信誓旦旦地保证：

“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听！袁世凯俨然成了共和制度的倡导者、捍卫者。但伪君子的“保证”是靠不住的。惯耍两面派的袁世凯，在同一份电报中就居心险恶地声称：“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原来，清朝皇帝的退位，是由他袁世凯认可的，变“帝政”为“民国”是他袁世凯一手造成的，他是缔造“民国”的元勋，“民国”理由由他来安排。所以，“宣布政见”，实际上成为袁世凯索取民国临时大总统官印的最后通牒。

二月十四日，孙中山辞职。次日，选举袁世凯继任。

孙中山对袁世凯是有警惕的。他特别提出制定《约法》和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这两项措施，借以约束袁世凯。袁世凯却把京津一带看作是他的基地，一再借故拒绝南下，唆使段祺瑞等通电全国，主张定都北京，以武力相要挟。孙中山毫不动摇，决定派出专使迎接。

二月二十七日，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专使蔡元培一行，到达北京。只见前门外彩棚耸立，正中斗大的“欢迎”二字用翠柏扎成。彩棚前方，持枪致敬的军队左右排列。专使一到，顿时军乐喧腾，礼炮轰鸣，被拥进富丽堂皇的宾馆。袁世凯又是欢宴，又是茶会，“热情”款待。他向专使表示：“略等三五天，如果北方平静，就一定南行”。

二月二十九日晚上，袁世凯正在盛宴专使团，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炮弹飞掠宴会大厅上空。有人传报说：“北京驻军反对袁大总统离开北京，闹兵变了”。不一会，专使团住所外面也人声喧哗。有的说，这是南使住所，不要惊扰；有的说，越是南使，我等越要接他；还有的说，袁大人要南去了，北京反正没人管，乐得闹一场……

丧魂落魄的使团人员，连跌带爬，慌忙从后院跳墙逃命。

第二天，报纸用通栏标题报道“兵变”消息，北京有千余家商民遭劫。保定、天津等地也同样发生“兵变”。

帝国主义为“护卫”使馆，增兵进驻北京，大有八国联军重演的架势。

被吓破了胆的专使们，早已把迎袁南下的使命抛到九霄云外。他们的新的“使命”变成了要求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三月十日，袁世凯踌躇满志地在北京宣誓就职。

## “皇帝总统”

袁世凯一上台，就翻辛亥革命的案。他攻击辛亥革命把什么都搞乱了：士兵多不服从命令，人民不知“公共利益”，“财政入不敷出”，“法律亦未完备”。总之，在他看来，经过辛亥革命的中国，简直糟透了！现在，他要遵循“古今立国之道”，“整饬纪纲”，收拾残局了。

在“整饬”的幌子下，袁世凯要求辛亥革命前“所有旧日政务”照样进行，“所有旧定之军纪警章”继续施行；他通告“前清诸法律”，“一律延用”。一度被革命党人没收的大地主、大买办的财产，也一一发还原主。盛宣怀曾为此专电感激袁世凯的“迭次宽大”。与此同时，打击革命的一张张布告，一道道法令，一则则条例，急如星火地通令全国。袁世凯还特别把清末镇压革命党人的特务组织，改名为“军政执法处”，由他的亲信陆建章控制，专门对革命党人和群众进行监视、逮捕、囚禁、杀戮，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光是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就有两千多人死于袁世凯手里。

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的骨干张振武、方维，不服从袁世凯的命令，支持革命武装活动。袁世凯串通黎元洪，把张振武、方维骗到北京，加以杀害。消息传出，全国哗然。袁世凯为了掩人耳目，假惺惺地表示要优恤死者家属，要湖北派专员迎接灵柩回武汉开追悼会；同时电邀孙中山和黄兴北上“畅谈国事”，借以平息全国舆论。

八月下旬，孙中山和黄兴相继到达北京。袁世凯指令亲信对孙中山要“盛大”欢迎，待遇“完全与大总统同等”。他让出了自己堂皇富丽的总统府，修缮一新，作为孙中山的寓所。孙中山在北京逗留不到一月，袁世凯同他晤谈了十三次，“革命元勋”的尊称不离口，对孙中山的一切主张，无不顺从，要尽两面派手法。九月和十一月，他分别授给孙中山和黄兴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和“督办粤汉铁路事宜”的头衔，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

一九一二年冬，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多数，沉醉于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大受鼓舞。次年春，他遍游长江流域五、六省，发表政见，满以为可以组织一个“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了。他决定三月二十日到北京组阁。

宋教仁得胜的喜悦，触动了袁世凯的神经，这个寸权不让的大野心家决定“别图补救”。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十时许，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检票处门口遭到枪杀。

袁世凯得讯后，大惊失色地问道：“有此事乎？”“快拿电报来！”看了电报后，脸上又堆

起了十分惋惜的神色，叹息说：“确矣！这是怎么好？”装模作样地电令有关方面彻底追查，“务得确情，按法严办。”追查的结果，真相大白，执行者是袁世凯的亲信“长江侦探科长”应桂馨，而主谋者不是别人，正是高喊捉贼的袁世凯和他的特务头子、内阁总理赵秉均。当时，有一副《挽宋教仁联》，一把揪住了袁世凯这个元凶：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均，我说是袁世凯。”

“宋案”剥落了袁世凯脸上那上一层镀成“共和”的薄金，人们开始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孙中山愤怒地指出“非去袁不可”。他从日本赶回上海，同许多革命党人，积极准备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

但袁世凯先下手为强，早在一年多以前，就通过“裁军减饷”的奸计，解除了黄兴“南京留守”的军职，把武昌起义时编组的八个师裁并成一个师，严重削弱了革命党的军事力量。他自己则扩军加饷，庞大的北洋军又扩充了几十营。帝国主义也拼命给袁世凯输血打气，一九一三年四月，给袁世凯一大笔新的借款，“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准备拥护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袁世凯有恃无恐，杀气腾腾地狂喊：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半年多以前，袁世凯迎接孙中山、黄兴时的笑容消失了，现在换上一副凶神恶煞的脸孔，要“讨伐”革命党人了。本来应受讨伐的罪魁，反过来变成了“讨伐者”。

反袁的“二次革命”没有把袁世凯拉下马，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被打散了。袁世凯大为兴奋，傲然四顾，“其奈我何”！他进一步要做的，就是把“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

十月十日是“民国”的国庆节。袁世凯想，如果在这一天莅任正式总统，外宾如云，百官朝贺，岂不锦上添花！可是按照规定应先制宪法，后选总统，这时宪法还没有影子，怎么来得及呢？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扬言没有正式总统，外国就“不肯承认”，示意各省区“军政长官”联名通电，要求先选总统，后制宪法。以老保皇党人梁启超为头子的进步党也出来捧场。就这样决定十月六日进行“选举”。

当天，议员们从早上八时开始，一连选了三次，袁世凯都未取得法定多数。这时，袁世凯收买好的兵痞、流氓、便衣军警几千人，便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国会围个水泄不通，狂叫：“今天不选出公民中意的总统，选举人不能出场一步！”议员们又饥又渴，又惊又怕，草草写上“袁世凯”三个字，投入票箱。检票唱名，票票都是“袁世凯”，“选举会”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公民团”完成了任务，欢呼离去。

就在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的日子里，国民党议员“欲图国会专制”、国民党议员参与“叛乱”（指二次革命）的谣言，忽然四起。据此，袁世凯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的议员资格。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凯进而把作为“民国”象征的国会也强令解散，那些原想抱着袁世凯的粗腿不放的议员，只落得个黯然神伤，恨恨

而去。有人曾写诗刻画这些国会议员的形象说：

愧来身价十万，可怜人民血汗。

血汗换得拥袁，免死狗同遭难。

袁世凯摧毁了国会，对辛亥革命仅留的遗迹——《临时约法》更不会放过。声称它对总统“限制过苛”，另行炮制了一个袁记“约法”。按照袁记“约法”的规定，总统拥有“朕即国家”的皇帝权力。随即制定了“修正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无限期连任，还有权推荐继承人。这样，袁世凯就由正式总统变成了终身总统，袁家还可世袭。

不久，北京的街谈巷议中，出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新名词——“皇帝总统”。

### 最后一幕丑剧

复辟狂袁世凯当上了皇帝总统还不满意，处心积虑想当一个真正的皇帝。

一天，袁世凯把国务卿徐世昌召到内庭。袁世凯叹口气说：

“民国成立已经数载，共和成绩不过如是，国事前途异常危险，请菊人（徐世昌的字）设法挽救。”

徐世昌说：“是啊！内患丛生，外忧日甚，还不如帝制来得安宁呢！”

袁世凯听了拈须大笑说：“菊人的话正合我意，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将来还要请君多多臂助。”

徐世昌满口应承。

袁世凯的皇帝野心，不只是他个人的品质，而是反映了当时走向没落的封建阶级共同的复辟愿望。有不少人接连上书，劝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心里想得耍命，表面却大为光火，说要对写信的人“严加查办”。有些不识相的清室遗老，以为袁世凯真的不想当皇帝，提出如恢复帝制，应该由宣统来当。这话让袁世凯知道后，他可真地光火了，马上批示叫内务部拿办。过了一天，在政事堂开会，袁世凯说，宣统皇帝“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暗示皇帝应由他来当。

然而，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必然要请帝国主义为他撑腰。帝国主义也正想在袁世凯身上捞取更大利益。

最早表示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是德皇威廉二世。他在接见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时，“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图强”。英国知道了这事后，急忙派了驻华公使朱尔典面见袁世凯说：“凡德国所赞成者，英当尽全力为之。”美国和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

但对于袁世凯来说，最重要的外国台柱还要算日本，因为他很相信自己的法律顾问、日本法律博士有贺长雄的一句话：“欲在东亚称帝，而不谋及日本，试问英德两国，能主持东大陆之政治变迁乎？”在东亚，日本是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以支持袁世凯做皇帝为诱饵，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带了“二十一条”到居仁堂见袁世凯。按外交惯例，外交条例应该送往外交部，但日置益径



直送给了袁世凯，并说了一句：如果两国能根据这些条款“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袁世凯一听这话，赶紧把“二十一条”收下，哪还管什么国际惯例不国际惯例。后来中日双方虽然又讨价还价了几个月，无非都是做给老百姓看的。

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他亲自召见立宪党人杨度，对他说：“共和不可维持，你何不约集一些人，就君主制度问题鼓吹一下。”杨度就找了一批下了台的当权派（如当过安徽都督的孙毓筠，当过山东都督的胡瑛，曾任上海光复军总司令的李燮和以及拥护复辟的改良派严复等等，凑成一个班底，名叫“筹安会”，打着“学术讨论”的幌子，要求“变更国体”。

袁世凯又召买办官僚梁士诒来，商议进一步行动的方法。

梁说：“就借‘民意’二字，号召天下，不怕天下不从。”

袁说：“谈何容易。”

梁说：“总统今日，只管反对帝制，照常进行。士诒愿为总统效力，一面联络参议院，令作民意代表的上级机关，一面另设请愿团，令作民意代表的下级机关，上下联合，民意便可造成。”

袁说：“这便仗你帮忙呢！”

梁起身应声：“是”。

于是，梁士诒就在九月十九日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一刹时，出现了许多“请愿团”，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他们拥到天安门前，又拥往内务部，闹闹嚷嚷，说只有袁世凯当皇帝，中国才会安定。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区也纷纷上书请愿，一封又一封的“国民推戴书”上真真假假的名单一大串，而这些请愿书和推戴书中的字句竟一字不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后，人们才知道袁世凯的心腹朱启钤等曾给各省发了这样一份密电：

“国民推戴书内，有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大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

原来所谓“国民公意”，这些纷至沓来的电文和请愿团体，全是袁世凯一手导演的。

一九一五年十月，号称代表各省区民意的“国民代表”，进行了决定中国国体的投票。“代表”们一进入投票场，每人就拿到五百银元的“川资”，同时领到一张事先印好“君主立宪”四个字的选票。投票是记名式的，每个投票的人都要在票上签自己的名字，这样谁个赞成，谁个反对，一清二楚。所以，全国“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没有一张反对票。

全国投票的结果汇总到北京后，参议院于十二月十一日宣称：“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要求袁世凯当皇帝。

但袁世凯还要假意推托一番，说民国初建时，本大总统曾经宣誓发扬共和，今天如果恢复帝制，岂不是背弃誓词，无信无义了吗？

参议院深知袁世凯是在做戏，就于当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一次劝进，并立即推定秘书当场起草“第二次推戴书”，参政会暂时休会。才过了十五分钟，一份二千多字

的文章竟象变戏法一样当场“起草”出来了。而按常识，象这样一份东西，就是一刻不停地抄写一遍，也得一、两个钟点！

戏实在演得不象，但对袁世凯的称帝，倒是着实帮了大忙。“推戴书”上说袁世凯当年赌咒“发扬共和”，是遵从“民意”，现在“民意已改”，誓词“当然消灭”，这叫做“视乎民意为从违”。这一说，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作了一番洗刷，也堵了人们的嘴，袁世凯可以不必有什么顾虑了。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居仁堂香火缭绕。只见袍褂与西装错杂，愁眉与笑脸相映。忽然，一乘八人抬的大轿子在前呼后拥之下抬进厅前。袁世凯到这里接受百官朝贺来了。他撤销了黎元洪的副总统职位，封为武义亲王，其他一百多人论功受封，各有爵禄。他下令改民国为“中华帝国”，一九一六年为“洪宪元年”，并定于元旦那天举行登极大典。

翻案、复辟不得人心。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当袁世凯忙着张罗登极大典的时候，云南爆发了反对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出后，各地群众立即痛斥袁世凯的叛逆行径。陕西群众提出了保护共和，推翻帝制的口号。河南起兵讨袁。上海、湖南工人罢工。革命党人纷纷组织讨袁力量，揭露袁世凯“借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残民意”的复辟倒退罪行。在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基础上，云南中下级军官发动的“护国战争”，很快就得到几省的响应。

尽管袁世凯头上的丧钟已经敲得震天响，他却依然不死心，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在新华宫进行了一次皇帝正式登极的演习。从除夕三更起，宫内礼乐齐鸣，卫侍肃立，在两对紫灯的前导下，“皇帝”、“皇后”双双出来，同升御座，女官们左右排列，“皇后”先向“皇帝”祝贺，然后“太子”袁克定及“皇二子”、“公主”一一行礼，女官传呼，鼓乐迭奏。袁世凯左顾右盼，好不惬意！

可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熊熊燃烧起来的反袁烈火，迫使帝国主义改变了对袁世凯的态度，原来用手扶，现在用脚踢。北洋军阀内部也迅速分化。曾经想继承总统宝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大失所望。“相国”徐世昌托故避居青岛。老板不再支持，亲信不再随从，就连袁世凯的家族内部也发生了内讧。长子袁克定和次子袁克文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袁世凯的一个妹妹也宣布同他断绝关系。袁世凯众叛亲离，落得个“殿上君臣神惨淡，灯前儿女泪纵横”。

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前后当了八十三天皇帝。但是，全国人民讨袁的声势继续高涨。五月底，连袁世凯最忠实的走狗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芑铭也通电宣告独立。载戟子立、形影相吊的袁世凯拿到电报后，“汗流浹背，目眩头晕”，一病不起。六月六日，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卖国贼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身穿衮龙皇袍，怀着复辟不成的怨恨，凄凄惨惨地进了棺材，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毛主席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时，深刻地指出：“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切搞复辟倒退的反动派，不管如何得计于一时，到头来终究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

# 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 身居要职之后

——评苏修短篇小说《身居要职》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评论组  
上海师大中文系七三届(1)班工农兵学员

“一阔脸就变”，这是当年鲁迅对国民党新贵们的辛辣讽刺。而通过苏修小说《身居要职》，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苏联社会也无时不在演出类似的喜剧或悲剧。

原来的生产工人李赫科夫当上了厂长，这固然不能算很阔，但——正如小说所说——大小总是个要职。何况李赫科夫的工厂生产的金属器皿、小锅和行军壶之类，东西虽小，但由于勃列日涅夫集团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反动政策，在市场上属于紧张商品之列，货色一到，就被抢购一空，这自然就更加提高了这位厂长的身价。

身份变了，脸就变了，连胃口也变了。“惯常吃的食物，闻起来气味也不那么好了。”终于，这个一向温顺而听话的儿子同在艰难的岁月里把他拉扯大的母亲之间，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吵：

“盖纳(李赫科夫的爱称)，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吃我们家里的饭的？”

“我不是在吃吗？……”他更使劲地咀嚼着说。

“我看着你怎么挑挑剔剔的……还不就是从你自命为贵人老爷的时候开始的吗？”

可见，胃口问题还只是导火线。在这个在磨床旁边干了整整四十年的母亲看来，儿子成了贵人老爷以后，“屁股后面冒了烟”，就把家给忘记了。身份突然变得高贵起来的儿子自然不能对此买帐——

“这小‘嘎斯’是我名份该坐的！”

是的，当上了厂长，屁股后面就得冒烟，“名份”理应如此。自然，按照“名份”，还得换上一套或几套更大更考究的住宅、别墅，——小说中虽然没来得及明确写上这一笔，但至少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李赫科夫阔了以后，就在城郊街上增设了一个“庇护所”，这是他的情妇米尔卡的家。也就是说，厂长除了正室夫人拉丽莎之外，又添置了一位补充夫人，或

称外室，比拉丽莎可要漂亮得多呢。这自然也是“名份”里该的。老实说，要不是米尔卡据说是除了“爱”他之外，“什么也不要求”，厂长即使换上了一位夫人，也没什么稀奇，这不过是换汽车、换房子的逻辑发展而已。君不见苏联离婚率之高，不是早已驰誉全球了吗？李赫科娃老太太，这个连外国人的名字都念不来的老婆子，真是未免有点少见多怪！

小说表明，不少人倒是比李赫科娃老太太着实要深明大体而且知趣得多。拉丽莎的母亲、李赫科夫的岳母，不就教导自己的女儿“要适应新的情况”吗？“新的情况”是：人们对待李赫科夫，由取笑和嘲笑换上了“亲昵微笑”，纷纷“祝愿他今后一路顺风，预言他前程远大”。这个丈母娘可真有“适应”力，在过去，自己多少有些嫌恶女婿的“外省土气”，而一旦证明女婿确实乘龙有术、高升有望之时，立即充分显示了她所“特有的外交家”的天才。她刚从外地回来跨进家门，不仅马上向李赫科夫三呼“祝贺”，而且“第一次”向他献上了“我们的一家之主”的称号。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天伦行乐图啊！

善于“适应新的情况”的，还有那位米尔卡。她与李赫科夫曾经相爱过，但大概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各自都另外成了家。然而，“新的情况”发生后，“再一次燃起了少女的火焰”。她梳妆打扮，把“厂长同志”迎进门去，殷勤地倾诉了自己的“爱”。至于为什么要“爱”，小说并未作明确的交代，我们只看到这样的表白：“不管你是领导也罢，或者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普通劳动者也罢，对我都是无所谓。……反正都一样，随便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反正爱你。”这种表白是必不可少的，要不然岂不是太有损于“爱”的纯洁和高尚了吗？

至于那位成为厂长夫人的拉丽莎，——别忘记，拉丽莎还是李赫科夫荣任要职的头号功臣哩。据小说介绍，李赫科夫本来是“一个胸无大志、极其平凡的小伙子”，正是权势熏心的拉丽莎，在“要更快地‘前进和上升’”的欲望的支配下，“一直卖力促使丈夫‘向上爬’”。虽然李赫科夫曾经对于妻子使他从来没有能玩个痛快感到抱怨，虽然夫妻之间曾经有过某种分歧，妻子要丈夫抓住省里有一个合适的空位子的机会，以便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而丈夫则宁可满足于在自己的家乡安命乐天地过着平凡而安稳的生活。但不管夫妻之间存在什么冲突，丈夫的荣任要职，终究是实现了妻子的“前进和上升”的夙愿。就连那位李赫科娃老太太在与当厂长的儿子争吵时也这样说，“要不是拉丽莎，那末你就不会出头”。然而，拉丽莎却悲哀地发现：“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不过看来这新生活里没有我。”她亲手把李赫科夫塑造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而英雄并没有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她所憧憬的幸福。李赫科夫既已成了一厂之主，理所当然地也要成为一家之主，这对于号称“善于发号施令，善于制服人”的拉丽莎，显然是不堪忍受的。拉丽莎费尽心机，鞭策和帮助李赫科夫去获得权势和地位，而李赫科夫在获得了权势和地位后，却要在拉丽莎的身上去试验和体味权势和地位的力量。于是，李赫科夫很快就“得出结论，她不再爱他了”。有作用必有反作用，因此，他也不再爱她了。拉丽莎的攀龙附凤，只不过是美妙的幻想，很快就如肥皂泡那样地破灭了。丈夫既然一步登了天，妻子当然只能孤独而悲哀地留在地上了。

生活就是这样的奇特。以李赫科夫身居要职为轴心，生活的车轮顿时来了个大翻个。母子、岳(母)婿、夫妻，以及还有别的其他什么关系，统统颠倒了过来。昔日同过患难的，现在相互怀着“敌意”。过去保持着某种距离的，现在却在廉价的献媚和颂词之中融合起

来。一度分手的，现在又重叙旧欢。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反倒成了同床异梦的冤家。在李赫科夫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奇特的变化呢？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阶级关系。当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发生变化后，他同周围人们的关系必然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争吵也好，逢迎也好，爱也好，恨也好，都不过是这种变化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反映。逢迎和爱表示了对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新贵的统治地位的臣服，争吵和恨则是流露了对于自己沾不上边的某种不满。这种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恶现象，绝妙不过地泄露和反映了今天苏联社会的本质。尽管小说把李赫科夫的高升粉饰为从“直接生产工人中提拔工作人员”的盛事，歌颂这是“活的体现”了“关于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融合，以及关于‘消灭界限’等等”美好的原则，尽管小说极力回避李赫科夫同他昔日的伙伴、今日的统治对象即广大工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但是我们从李赫科夫同他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中，还是可以看出在今天的苏联社会中一个工人是怎样一步步地变为官僚统治者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分析一个人同人们相互关系的变化，就不难判断他的阶级属性。

有趣的是，这位李赫科夫一开始倒并非名利熏心之徒。他“胸无大志”，对“读书做官”这一套并不热中，而是欢喜过小乐惠的生活。正是三个女人——妻子、岳母和母亲，“十年来老是嚷个不停：大学，大学”，逼着他艰难地通过所谓“红色专家”的途径，终于跻身于新资产阶级分子的行列之中。当然也还有其他，例如领导的教诲之类。李赫科夫的母亲指责儿子“是个利己主义者”，但她与她的媳妇以及亲家一个劲地催促着李赫科夫“升吧，升吧”，又何尝不是出于利己的动机？她们指望从李赫科夫的高升中分享特权和喜悦，但最后带来的却是失望和懊恼。至于李赫科夫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同样也“陷入潮涌而来的悲伤之中”。这固然是他们的自作自受，但罪魁祸首又实在不是他们。因为按照那里的规定，拿到了一张毕业证书，就同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划上了一道鸿沟，“谁会答应他这个有毕业证书的工程师依旧当一名普通的冲床工呢！”也是按照那里的规定，当上了工程师、厂长之类，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拥有汽车、好房子以及其他“名份”里该的一切。当李赫科夫心安理得地享受“名份”里该享受的一切时，也就意味着他最终离开了本阶级，成了一个“利己主义者”，一个新资产阶级分子。归根到底，这一切都是由勃列日涅夫之流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虽然小说极力用家庭纠纷掩盖更为深刻的社会矛盾，但即使这些家庭纠纷，毕竟也是苏修社会一角的反映。这个社会，名为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限制，却反而由它在统治着一切，“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李赫科夫在身居要职后，演出的就是这样一幕悲喜剧。而在今天的苏联社会中，每月每日正在各个场合无数遍地重复上演着这种在老牌资本主义社会中早已司空见惯了的悲喜剧。何时结束，不得而知，看来总得等到苏联人民起来推翻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统治以后。到那时，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该可根除了吧？

## 附：《身居要职》故事梗概

作者 尤利·格拉契夫斯基

(载苏修《顿河》杂志 1974 年第 3 期)

李赫科夫好不容易拿到了“金属冷加工工艺工程”函授毕业证书。那是在第十一个年头通过的论文答辩以后。

多少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可是这下子却立刻出现了岔道：往后怎样生活，向何处去？

李赫科夫反复地盘算着。要是再干冲床这一行吧，谁会答应他这个有毕业证书的工程师依旧当一名普通冲床工呢！果然，厂长尽他的所能，连劝带命令地说：“需要，李赫科夫，需要！我们在新的工段需要的不是官僚主义的领导，我们需要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需要自家树干上长的枝子——总之，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呀！”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李赫科夫表示同意。

他认为，至少自己的妻子会理解他的。但这一次，女人们象事先商量好了似地一起反对：过去每月拿回家二百卢布，而现在固定工资是一百三十五个卢布，这不太吃亏了吗？新工段费力不讨好，还得把自己的私蓄都贴补上呢！

可不是吗？真是毫无办法。但她们干吗十年来老是嚷个不停：大学，大学！……他起早摸黑，从来没有能玩个痛快，把最美好的黄金时代都放过去了，又是为了个什么？要是当时不听她们的话，肯定也会及时行乐，不致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青春，而今天倒反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但妻子拉丽莎是一个精明的女人，一切事先都有个盘算。她反复劝说：“你已经取得毕业证书，尽可以另想别的办法施展你的才能：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家小厂。比起我们这城市里的厂来，尽有规模更宏伟、前程更远大的……需要寻找，盖纳基，需要寻找！……”

李赫科夫懂得妻子的善意劝阻，可他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象那些器量小的、骄傲自大的丈夫。到省里，到公司管理处去占别人的位置吗？——这样做法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他多少还有一点自尊心。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按自己的兴趣或者愿望把命运改变过来。

于是，他听从厂长的建议，接受了“坛坛罐罐”工段的工作。工段正式名称是“日用品车间”。他当上了还不存在的车间的主任。生活的新阶段就这样开始了。

“扎奥斯特洛夫斯克柴油机厂”座落在城边乌萨河的一个河弯处。这是一家老厂，还保持着战前的传统。它的力量就在于稳定，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这保证它能从容不迫地、均衡生产内河小船发动机。现在让李赫科夫搞的“坛坛罐罐”就是要用那些不好意思作为垃圾报销掉的金属废料来制造。

尽管小商品并不那么复杂，然而搞起来困难还真不少。李赫科夫没有能得到通常在开始大规模事业时总能得到的全面支持。拨给他的设备尽是些破旧的东西——一些冲床和汽锤，只能用来砸秋天在乌萨河沿岸小山沟和山岗上采集来的胡桃。毫无办法。既然暂时还不可能搞到新的，就得把这些老家伙凑合着使用。

李赫科夫就这样干开了。这位新上任的领导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地在各个部门、车间到处奔忙乱跑，寻找蓝图纸、流程图和其他资料，铸造新的阴模，打出阳模和钻头……

一个月过去了，李赫科夫却还没有冲压出一只“坛坛罐罐”。非难照例纷纷而来。各方面的旁观者给

他吃足了苦头；工作上纠缠不清，家里又不断地唠叨。拉丽莎出于怜悯，劝他趁早撒手不干算啦。

可他不能这样。他向来认真负责。既然交给你办的事，你就必须咬紧牙关努力去完成。划船应该划到对岸，不能在河中央就跳下船。想到这些，他又开始划行了。

转眼已是夏天。李赫科夫更忙碌了。现在他没有时间休息，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地扑在生产上。他整天忙于组织工作，也就顾不上家里了。

李赫科夫的家里一切并不那么顺遂。母亲和岳母相处得不很和睦。

母亲比较朴实，比较平易近人。她是个生活道路比较平坦的女人。她生在扎奥斯特洛夫斯克，老家就一直在这里。她在“柴油机厂”操作磨床，干了几乎整整四十年。所以她在当地环境中能自在地生活。

岳母是个外来人。虽然她第一批疏散时就来到这一带，但她至今仍自认为是首都来的妇女。她刚来他们家的时候，对繁忙的家务从不多插手。待到他们搬进设备齐全的三间套房以后，她就完全摆脱了日常家务。她自认为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教育外孙们。假如没有她指引，那末他们生活在李赫科夫家，就有沾上“外省土气”的危险。但对于如何教育孩子，母亲却又和她的看法全不一样。

就这样，虽然她们没有大声争吵过，但妇女们都是善于不动声色地互相挖苦几句，脸上仍挂着微笑，谁也抓不住谁的碴儿。但是窒息人的烟雾却始终消散不了，使大家都感到在家里呼吸困难。

再说，李赫科夫同拉丽莎生活也总是不那么协调。特别是现在，他工作越专心致志，拉丽莎就变得越忧愁。她不但不予支持，反而给他泼冷水：“盖纳基，你丢掉这个餐具小铺吧！麻烦事多得不得了，而好处微乎其微。”

“我不能啊，拉丽莎。既然把工作委托给我，我就应该把它搞起来。要讲工资嘛，你不要着急，慢慢会解决的。”

争吵激怒了拉丽莎。他们之间的分歧加深了。怎么说呢？李赫科夫大学毕业，还当上了领导，可拉丽莎仍嫌不够……于是，家庭纠纷就从这里产生。

拉丽莎是个精明的女人，学问渊博而又脾气倔强。她善于发号施令，善于制服人。李赫科夫同她结婚的时候，拉丽莎还真有点看不起这个胸无大志、极其平凡的小伙子呢！拉丽莎抱的目标很远大，在她心中总是燃烧着一股不灭的欲望：要更快地“前进和上升”。而盖纳基呢，按她的说法，是“放平的石头”。所以得经常地督促他。这可是她判断上的错误。她不明白，进取心固然需要，但不能莽撞，应当量力而行。要不然，爬得超出了能力准会“唉哟”一声跌个倒栽葱。李赫科夫当然懂得这些，可是他不愿说出来。

继续争吵也没有用，反正生活会自行证明的。不管拉丽莎乐意不乐意，他对自己的日用品早已入了迷。

应当承认，他真正爱拉丽莎，虽然她称不上美丽。他的第一个情人米尔卡可美丽多了：长得黑黝黝的，她的眼睛是暗棕色的，那是一双使人产生强烈印象的眼睛。但现在除了拉丽莎之外，他谁也不需要；但愿能和她一直和睦相处，正如报上常说的，建立最充分的相互了解。要能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了。过去他总是无条件地采纳和服从她的一切意见，现在却第一次自行其是起来。但这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对她的叛逆，他是出于良心和正义。拉丽莎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不然，他们的整个爱情将受到沉重的打击。

终于制造出了第一个模压的样品。李赫科夫发现茶杯的边卷得不怎么圆。人家建议他简化工艺，不用卷边，把边缘切齐就是了。但他却鼓足了勇气，自作主张地把简化方式生产的货样报废了。这样，车间就不能进行成批生产。

这一行动激怒了大伙。厂管理处也耐不住要把这初出茅庐就敢轻举妄动的家伙整一通。总工艺师戈柳诺维奇严厉地责问他为什么要使工序复杂化，李赫科夫小心谨慎地作了解释。于是，胖子戈柳诺维奇限他三天时间解决棘手的卷边问题。

卷边的杯子搞出来后，李赫科夫心情十分舒畅地回到家里，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吹起了轻快的口哨。但拉丽莎却讪笑他：“瞧你这个模样，似乎是《体育罗托》中了彩，至少赢了五千卢布吧。”

工作总算是有了一些起色，但是原料又成了大问题。起先认为不用操心，反正是废料，自己厂里多的是，

扔得遍地都是的，又不需要谁来供应。可是，要把过去当作垃圾报销的东西捡来重新利用，要把废料很好地加以保管，清点，跟其他财产一样建立报销制度，严格地全部移交给新建车间的专职验收员，使经济管理人员反而增添了一件新的操心事。人们都不愿意这样做。

冷压车间主任普利津第一个埋怨起来，他是厂里最有威信的元老之一。李赫科夫打年轻时就在他手下干活，他已经习惯于把李赫科夫当作自己的永久学徒和部下。而现在这个向来安分守己的青年突然竟想对他发号施令了。这使普利津大为恼火。他决心把这暴发户整一整：你要我的垃圾，那就自己来拿，我可不想在废料堆上浪费时间！

厂长自从提升李赫科夫为车间主任的那天起，就千方百计地设法巩固李赫科夫得到的成绩。他没有让自己最受人尊敬的助手和同事普利津进一步发泄下去。找个机会，他低声训斥了普利津一番。接着，又故意提高声音，吩咐坐在身旁的总工艺师草拟一条命令，订出详细办法和手续，一律把废料转交给日用品车间。随后，厂长还对大伙儿说：“废料就是我们的第二富源。我们一定要珍惜它，学会利用它作生意！”

打这以后就清楚了：不能再开玩笑。为了证明李赫科夫工作的重要性，厂供销部主任玛丽雅·巴甫洛芙娜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外面都在抢购我们生产的杯子”，这位胖大婶敏捷地汇报说，“现在，商业部门还在要求其他器皿：快！快！这可不是无所谓的小事了……”

李赫科夫真想引吭高歌，因为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柴油机厂”团结一致的上层领导在情绪上已经给他争取过来。过去，人们对他本人和他的“坛坛罐罐”都有一种轻蔑的态度，现在也开始有了转变。胜利使他的心情充满着欣欣向荣的春天气息。

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他和拉丽莎一起回家。一路上，他带着孩子气向拉丽莎自夸着意外的成功。“啊！拉丽莎，结果好极啦！我胜过了我们这些头头，尽管他们是老资格，在那种会上坐破的褥子也不止一条了。”但是，她没有同享他的喜悦。

“进一步怎么样呢？”她懒洋洋地问。

“进一步？从防御转到进攻呗。”

“你高兴什么呀？真是个怪人。”

“我高兴的是我们正在掌握取得胜利的科学。……要是严肃些讲的话，那末，明天什么都合法化了，我就能要求我应有的一切了。是要求，而不是请求——这是不是有区别，你说说看？”

“我看没有什么区别”，拉丽莎想说服他，“你不务正业。过去被人嘲笑，以后还要被人嘲笑。你是一个初出道的，应该树立威信，而你却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但李赫科夫却表示不在乎。

“啊，盖纳，盖纳，你要吃苦头的，你可真是头脑简单的人！”拉丽莎警告说。“在你看来周围的一切人都是长着翅膀的天使。那个普利津多少年没提升你！老把你钉在冲床上，连一个工长也没有升！我反正嘴上不说，心里可痛得厉害。”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我也不愿意当工长。”

“你不想当是不对的。不过那时候你只得服从，可现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听了这些话，他真的高兴起来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明白现在我做的是对的罗。”

但是他的这种推论引起了拉丽莎的愤怒：“我？！你知道一切都可以翻转过来！”她又重新回到了那令人不愉快的话题：“就依靠你现在的收入，我们即使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能够办到吗？”

“你答应过不提钱了。”

“答应过。你知道我也不喜欢打小算盘的。但是没有钱，怎能对付生活呢？……如果到了秋天你要做衣服还是大衣什么的，又怎么办呢？”

“暂时还可以凑合……”

“要凑合到哪一天才算到头？你好歹也算个领导啦……”说着她突然稍为露出了一点口风：“听着，盖纳基，我听到省里有一个合适的空位子。只要有毕业证书的工程师就行。其他都答应安排……我希望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吧？……”



这时，她的声调变得更温和，更善良了。但是他却几乎控制不住，要发作了。

“你是说你自已吧？”他挖苦地问道。

她并没有理会他的挑衅，倒是有些感到伤心：“哎，你每一次都是这样曲解我的意思！”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我是说中了。”

“我自己总能安排的，我说的是你。”她叹了一口气又重复了一遍：“是你，我亲爱的！”

“你自己安排去吧。我在这里不错嘛！”他回答得比平时说话更响，连走在他们前面的锻造车间那些熟悉的小伙子们也开始转过身来，留心听着。

“……还还不错！可你把我们全都忘啦？……不，盖纳基，你过去是怎么一个利己主义者。现在也还是这么一个利己主义者：只考虑自己一个人。”拉丽莎小声地说着，差点儿没哭出来。

这样的谈话太不愉快了。他起先想表示不赞成她的意见，并且证明她是不对的。但争是争不完的，而且她的指责已经达到了明显地不公正的地步，所以他也并没有反驳。好吧，时间会证实谁是对的！

李赫科夫的车间已经全面投入生产。那天是星期一，公司管理处派出一个委员会正式验收新建成的车间。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验收员们对年轻组织者的工作很满意，认为他干练地、富有魄力而且有条不紊地安排好了工厂的特种产品生产。厂长也因为富有勇气和主动精神而受到了称赞。人们说他敢于从所谓的直接生产工人中提拔工作人员，善于在列兵中物色指挥员。

人们指出，这是一种合理的结合：同一个人既是有经验的工人，又是有毕业证书的工程师。这个着眼于将来的试验，是值得提倡的榜样。关于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融合，以及关于“消灭界限”等等写得够多了。能够亲眼看一看活的体现，这叫人感到多么高兴呀！人们还祝愿李赫科夫今后一路顺风，预言他前程远大。

李赫科夫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毕业考试。他从来没有考得这样成功过。这样的节日他也从不曾有过，考个及格已经不错了。可这次根本不同了，今天他当了英雄。

他很可惜拉丽莎不在旁边。要是她看到这场面，无疑是会和他一起欢乐一阵的。如果她能相信，他没有成为一个到处追逐高薪的人，没有为了碰运气而到处漂泊，而恰恰就在这里，在自己的家乡获得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和真正的使命——如果她能相信这一切，那该多好呀！这样，她就再也不会象从坑里挖萝卜似的拖着上市去待价而沽了。而主要的是，她再也不会生那些闲气了。

但是，幸福和悲哀是形影不离的。正在这庆幸的时刻，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那天早上，李赫科夫十一岁的儿子柯尔卡瞒着大人偷偷地溜到木码头，擅自驾起新安上发动机的自家的小艇“快游能手”号作航行冒险，终于在乌萨河上隐约的漩涡里丧了性命。直到第二天早晨，在离家五公里的地方的“下游码头”附近，沉默无言的河流才把小孩的尸体浮了起来。

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幸，使一家人再也不互相责怪了，争论和抱怨全部停止，屋子里静了下来，象死一般的沉静。生性孤僻而固执己见的拉丽莎用一堵沉默的墙和所有的人都隔绝开。从那不幸的时候起，仿佛家里人都变成了外人，甚至丈夫也包括在内。拉丽莎变了。李赫科夫看到她十分沉痛的样子，也就不忍心再用问题或责备来使她难过。他尽量控制着自己，然而，他们并没有相互接近，相反，却是一天天相互厌弃，疏远着。

在工厂里，人们都为李赫科夫感到惋惜，对他表示同情。但是工作还是工作，对他的要求并不因为他的悲伤而有所减少。人们的要求很明确：你既然答应了，那就照做吧！在这种对他的固执要求中包含有某种隐藏的善意：不能让一个人陷入潮涌而来的悲伤之中。

快到秋天的时候，李赫科夫开始接到对他那“坛坛罐罐”的批发定货。车间产品也丰富了。勺子已经不光是勺子，而且是配了套：行军用的一套“餐叉——勺子——刀”。带把的茶杯涂上了白糖瓷。既然五金日用品生产真的有了起色并且在日益发展，大家也就把他当作一个精干的经济部门负责人看待。嘲笑听不见了，慢慢地甚至忘记了起初曾窃笑过他。这时，李赫科夫也稍稍鼓起了精神。做不尽的日常琐事，使他摆脱了痛苦和沉重的心情。由于他努力工作，终于，当创建一个专门生产日常必需品的独立

分支工厂时，李赫科夫得到了高升，成了分支厂的厂长。那厂根据他的建议取名“快游能手”。

现在，人们开始注意他了。他所没有期待、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已经发生：他拒绝寻找位子和职务，没有去到处钻营，弄得忙忙碌碌——可是你瞧，重要的职务却自动找到了他。

当随便那一个朋友或者熟人带着好意的亲昵微笑，对他说：“你游得好快，李赫科夫！总共还不过一年光景。”他总是叫那开玩笑的人别忘了他在学院里受罪的年头，那时甚至不能让自己多去一次电影院。他还说，在这“一年光景”中包含了他在工厂走过的整个道路——从钳工学徒到车间主任。

只有他那至今一直卖力促使丈夫“向上爬”的妻子，看到他的辉煌前程已经显现在眼前，却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高兴。突然间，和他有关以及和他的成就有关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成了无所谓的和与己无关的事情了。李赫科夫于是得出结论，她不再爱他了。

家庭关系终于破裂了。春天，拉丽莎出发到列宁格勒休假去。他们冷淡地告别。火车开动前，拉丽莎仅仅从车厢的窗子里对丈夫点了点头，甚至没有微笑一下。妻子走了。她就以这样的形象深深印在他的记忆中：笑也不笑的，象生人一样。他甚至不相信，这就是他的拉丽莎。

这时，李赫科夫过去的恋人米尔卡开始明显地倾心于他。下班以后，她时常在厂门口通往河滨街的林荫道上赶上他，随便聊着，一路回家。有一次，他不知不觉地把她送到了家。米尔卡开玩笑地请老朋友到自己家里去，李赫科夫拒绝了。但一天深夜，李赫科夫真的去了。“新厂长同志，您是来看望了吗？”米尔卡试图用这种笨拙的大胆话来掩饰自己的慌乱。

“我不过是正好路过……看来我到底还是来的不是时候？”他急忙道歉说。

“你来我总是高兴的。”这还是第一次又象从前那个米尔卡在讲话了，声音是这样地充满信任，宛如唱歌一般。

气氛很快缓和了。他们沉湎于不可抑制的回忆，相互讲不完地讲着那成家之前生活中的许多琐事。往事犹如在眼前一样，而且仿佛取代了现实。

突然，米尔卡想起说道：“我听说了，你跟妻子不和睦。”

“听谁说的？”

她不喜欢他这种生硬的口气。但是她没有让步，而是同处理其他人的关系一样，也试着寻找一把打开他内心的钥匙：

“盖纳，你为什么在我面前摆那么大的架子？……你在这深更半夜来找我，大概总需要我吧。”

他也感到不自在起来。真的，你又不让人亲近你，又怎么能取得她的同情呢？还是如实招吧。所以他说：“请原谅，米尔卡。但是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拉丽莎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悲伤逼得她这样的吗？”

李赫科夫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过去老是怪我不好，因为在她看来，我一生什么成就也没有，而现在——”

“而现在有成就了，你是这样认为的吗？”她狡诘地问道。她的眼睛里再一次燃起了少女的火焰，闪烁着久已熟悉的为她米尔卡所特有的火花。

“我根本没这么想，”他吐露真情地抱怨道。“我生活，尽我所能地工作。可是她，拉丽莎……我无论如何也琢磨不出，她在生活中到底需要什么。”

“你自己需要什么呢？”

“……”李赫科夫哽噎了。

突然，米尔卡俯身凑近他，好象有人会偷听似的，轻声说道：“可是我需要的只有一件事，盖纳，只要你和我在一起，那怕待一会儿也好。不管你是领导也罢，或者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普通劳动者也罢，对我都是无所谓的。你要是跟我一样，那甚至可能还更好些……反正都一样，随便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反正爱你。”

听到这些话，他感到何等的温暖啊！在这以前，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谁对他说这样的话。同她在一起，他感到很轻快。他振作起精神，慢慢地摆脱了由于去年夏季的不幸事情以来造成的心灰意懒的情

绪。对这一点他是感激她的，虽然她并不要求任何感谢。她什么也不要求，甚至没有要求他答应拉丽莎回来以后他还要留在她身边。而他也没有应允她这一点。工厂和米尔卡的住所占去了他全部的心思，他仿佛把家忘了。

李赫科夫生活完全改变了。现在，他对自己那空洞洞的大房子象完成任务一样只是走去看一下。为了不使母亲生气，他晚饭还是在家里吃。然而以前是高兴的事情，现在却成了一种义务。过去惯常吃的食物，闻起来气味也不那么好了。他啃着，呷着，却只是装个样子。母亲看着这种滑稽的样子，感到羞愧。她忍耐着，忍耐着，终于忍不住了：“盖纳，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吃我们家里的饭的？”

“我不是在吃吗？……”他更使劲地咀嚼着说。

“我看着你怎么挑挑剔剔的……还不就是从你自命为贵人老爷的时候开始的吗？”

他呆了一下，放下了餐叉。以前，她从来没有对他这样不信任。生气是有的，但怀敌意却从来没有过。“妈妈，你这是从何说起？你说……嗯，我算个什么老爷呀！只不过胃口不好。”

“成天价既不抡一抡锤子，又不动一下身子，胃口叫它怎么来呢？”

这种话他还没有听到过。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因为你儿子稍稍高升了一些吗？”

“升吧，孩子，升吧！不过不要对我们显得高高在上，也不要脱离我们！”

“你们要我怎样？”他生气地说。

“希望你不要路过家门口不进来。你步行时倒还认得回家。可自从屁股后面冒了烟以后，……”

“这‘嘎斯’是我名份该坐的！”他打断了母亲的话。“那么按你们说应该拒绝吗？”

“既然舒适，那就随你坐吧！只是不要老打家门口开过去！”

原来话锋指向的是城郊街……然而那儿是他的庇护所。任凭为了哪个人，任凭为了什么，他都不准备放弃这个庇护所，也不会让任何人闯进那儿去，甚至是母亲。

他马上摆出一副准备自卫的样子说：“嗯，妈妈，这是我一个人的事！”

“‘一个人的事’？”安娜·尼基福芙娜生气了。“好歹你是拉丽莎的丈夫！”

“可我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盖纳，不应当抱怨！你那个有什么不好呢？……我到死也忘不了，要不是拉丽莎，那末你就不会出头。你就会成为象我一样的半吊子，直到领取退休金时，还在冲压同一只零件。……”

“这样可能还更好些！”他很激动，匆匆打断母亲的话，还没吃完就跳起来离开了桌子。母亲轻轻地叹了口气作为回答：“可不，拉丽莎说对啦——你是个利己主义者。”

母亲的责备使他难堪，他不由自主地纳闷起来，难道还象小时候一样作出保证：妈妈，请原谅，我不再这样了吗？不，这不可能。整个集体都压在我的肩上，我带领整个集体走向同一个方向。我没有错……

炎热的夏天又来到了。如同告别的时候一样突然，事先没有任何通知，没有拍电报，也没有打电话，拉丽莎和岳母一起从列宁格勒回来。

那天晚上，他比平日早就匆匆赶回家。岳母见到他很高兴。她满意地向着他走来，以自豪的姿态摘下鼻子上的眼镜，吻了一下女婿的脸颊，亲切地祝贺他被批准担任要职，祝贺他的“快游能手”工厂取得成绩。

“啊，”他不自然地摆了摆手，“暂时只不过添了些烦心的事。”

母亲笨拙地插嘴道：“现在我儿子几乎从不在家啦。老是忙呀，忙呀，也不分白天黑夜的……”

岳母依旧淡淡地微笑着，一针见血地反驳道：“嘿，那我们倒还得检查检查，我们的一家之主夜里在忙些什么事情呀！”她是第一次称盖纳基为“主人”，但她立刻就以自己特有的外交家手腕把话扭回了一点：“要知道我和拉丽莎走的时候，他还没有被批准呢。而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大的成绩！”

拉丽莎默默地房间里出现了。她仿佛不是在自己家里，而还是在作客，或者在路上，拘谨地缩在长沙发的角落里。她迟迟没有开口，仿佛是在暗中对自己诉说着什么。终于，她下了决心，直瞪瞪地看着盖纳基，轻声地说道：“这是命运在惩罚我，我太贪得无厌了……”她又沉默了，从包里拿出了一块手帕。



## 狗的乐园

舒浩晴

巨大的横幅上写着醒目的口号：“狗是人的最好的朋友”。在狗展览会上，专家们对一千二百八十七只狗的外貌、种类、血统进行了评判。评判后，三百名奖章获得者游行穿过闹市……

这个盛况空前的狗展览会是在哪里举行的？纽约或东京？伦敦或巴黎？不，这是不久前在莫斯科出现的轰动一时的场面。据报道，莫斯科养狗成风，去年就有八万人养狗。最近，莫斯科市苏维埃为了不让资本主义国家的“狗餐厅”、“狗服装店”、“狗夜总会”擅美于前，专门作出了决定，要让狗在用栅栏围起来的“狗俱乐部”内自由自在地活动。号称“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就这样地成了狗的乐园。

别误会，狗进了乐园，并不意味着人进了天堂。莫斯科露天市场上一条纯种小狗的身价是八十卢布，而今天苏联许多工人每月的工资却只有四、五十卢布；狗可以享受精美的食品，而苏联人民却被迫排队搜购“小型面包”；市苏维埃的官老爷为“狗俱乐部”费神操心，而多少人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仍分配不到住房。狗贵人贱，狗尊人卑，人不如狗，这便是资本主义复辟后的无情现实。勃列日涅夫不是赌咒发誓要“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吗？他总算用养狗事业的“发达”，兑现了这一诺言。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曾经痛斥那些以养狗为乐的有闲阶级是“狗贵族”。今天的莫斯科成了狗的乐园，正是由于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狗贵族在统治着的缘故。生活在这种狗的乐园里，狗们无疑是要感激涕零、三吠乌拉的了。但那里被统治着的人们将对此作何感想，有何行动，不知勃列日涅夫之流想过没有？

---

“拉丽莎呀，要适应新的情况，”母亲谨慎地劝导她。“得开始新的生活。”

“妈，可没有那么简单。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不过看来新生活里没有我。”拉丽莎摇摇头又沉思起来。他为她难过，几乎禁不住要出声怜悯她。她需要安慰。但他忍住了没有这样做。

显然，要恢复到跟过去一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了。在这段时间里，李赫科夫已经及时地明白了：生活就是这样的。需要的只是任何时候都不陷于绝望，而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安稳地做你自己的工作。

# 人间沧桑话“准巴”

西藏自治区 李文珊

请打开我们伟大祖国的地图，在青藏高原的西南角上有个隆子县，隆子县的东南部有个加玉。早晨骑马从加玉出发，沿着苏班西里河顺流而下，到晚上就可以到达我国西南一个最遥远、最偏僻的雪山边寨——准巴人民公社。

祖国边疆的风貌叫人多么神往：连绵的喜马拉雅群峰陡峭挺拔，山顶白雪皑皑，象是一个个不倒的白头老人。原始森林极目无垠，喜马拉雅松、青冈树和红杨，郁郁苍苍，漫山遍野。在深山峡谷，苏班西里河宛如银色的带子，一泻千里。汇入苏班西里河的条条支流，飞流直下，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河谷两旁，牡丹一样的达玛花，玫瑰似的麻雀花，争芳斗艳，香气扑鼻。整洁的房舍建筑在台地上，村寨四周是麦浪滚滚的层层梯田，流水淙淙的纵横渠道。村寨上空，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准巴人民公社，就座落在这景色如画的山谷中。

准巴，在黑暗的封建农奴社会，是典型的人间地狱。它地处边陲，山势险恶，交通极为不便，四百多年前，西藏的农奴主阶级便把它作为“犯人”流放地。一批又一批的无辜农奴，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终身苦役”，戴上叫做“策果策加”的脖枷和脚镣，由凶恶的藏兵押着送进准巴。那时通准巴的道路是“山羊不敢走，猴子也发愁”的羊肠栈道，特别是还要攀登一架“天梯”。那四十五级、高达十八公尺的木梯，名叫“普鲁根则”，意思是只要在胸前兜个喝茶的木碗就无法攀登上。梯子紧贴垂直的石壁，下面是碎石垒起的石墩，上面是云雾缭绕的山峰。从“天梯”向下望去，令人头晕目眩，稍不留心摔下来就会粉身碎骨。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流放者，通常都是由支差的农奴用筐子背着上去。他们一进入准巴，就终身与世隔绝，在死亡线上挣扎。“流放者的家乡，是老鹰都要缩起翅膀飞

的地方”。那时，人们就是这样形容准巴的。

除了流放来的“犯人”，旧社会的准巴还有另外两种人：一种是被珞巴头人当作牲口卖到这里的珞巴族兄弟；一种是被农奴主逼得走投无路，冒着生命危险逃到这里的流亡者。要说这两种人和流放“犯人”有什么区别，只在于一个戴枷，一个还没戴枷。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派到这里来的“准旺久溪卡”的“溪堆”<sup>①</sup>和他的代理人，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压迫剥削他们，光差税就有三十多种。“犯人”和农奴住的是深山老林，吃的是用树皮磨成的粘粑，穿的是野牛皮、树叶子，用的是石头锅和泥巴碗。他们毫无人身自由，动辄惨遭毒打，甚至被投进三丈五尺深的“蝎子洞”。从外地逃来这里的农奴顿珠，一家七口人，十多天时间就饿死了四口。顿珠死后，他妻子用绳索把他拖到深涧让狗吃掉，然后领上幸存的两个孩子，又逃往外地乞讨。反动农奴主的残酷压迫激起了奴隶们的愤怒反抗。和平解放西藏前夕，一位叫赤列多吉的农奴，不甘忍受三大领主的血腥统治，在拉萨街头喊了声“共产党来了！”就被判处“终身苦役”流放到准巴。他到准巴后又气愤地大喊：“我们的父母共产党要来了，你们这些吃人魔鬼的末日到了！”结果被农奴主阶级用乱棍活活打死。奔流不息的苏班西里河，流不尽农奴的血和泪！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对准巴劳动人民昔日的苦难生活，实在是难以想象啊！

## 二

民主改革运动，特别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准巴发生了天地翻覆的变化。尽管我们这次对准巴的访问是短暂的，但所见所闻却使人深深地感受到，在祖国这个最边远的公社，处处都闪烁着文化大革命的光辉。

人民公社的诞生，就是文化大革命给准巴人民带来的一大丰硕成果。一九五九年的民主改革运动，流放者砸碎了镣铐，奴隶们安了家，准巴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粮食达到了自给有余。但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发生了两极分化的现象，粮食生产也掉了下来，成了缺粮乡。文化大革命前，六十多户人家的一个小乡，每年就需要国家供应和救济口粮一百克到二百克<sup>②</sup>，真使准巴劳动人民心里难受！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了准巴山谷，准巴群众奋起狠批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认定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伟大真理，于一九七〇年正式成立了准巴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我们看到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数字：公社成立的一九七〇

① “准旺久溪卡”意为镇压奴隶的地方，“溪堆”类似保长。

② 一克粮食为二十八斤。

年,全社粮食总产为九万三千二百二十九斤。从那一年开始,粮食产量便直线上升:一九七一年十三万多斤,一九七二年十六万多斤,一九七三年十七万多斤,一九七四年十九万多斤,去年又猛增为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九十多斤,单产平均达到了三百四十一斤。从一九七三年起,准巴人不仅摘掉了缺粮的“帽子”,年年还能有余粮卖给国家,仅去年一年,就出售了二万八千六百多斤。民主改革时,全乡只有耕地二百多克<sup>①</sup>,牲畜五百五十多头(只),现在全社已拥有耕地六百七十九克,牲畜一千三百三十七头(只);耕地扩大了两倍以上,牲畜增加了近一倍半。罗列这些数字也许使人感到枯燥,但它不是准确地说明了许多问题吗?

一九七三年,全准巴实现了公社化;就在人们欢庆这一胜利时,滚动着尘土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进了准巴山谷。真是喜上加喜啊!整个准巴都沸腾了。旧社会,因为交通闭塞,与外界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准巴偌大一块土地上连骡、马和毛驴都没有一头!民主改革当中,人民政府和驻军拨款、抽人、出物资,帮助准巴人民迅速修通了通向外地的骡马大道,紧接着又给他们送来二十二匹骡、马。当时,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牲畜的准巴群众,看见它们都吓得躲到一边,甚至骡、马打一个喷嚏,牵着骡、马的人还要扔下缰绳跑开。今天,他们不仅有了一大批骡、马和毛驴,有了新式步犁、脱粒机、手推车等一批新式农具,而且有了“铁牛”!具有回天之力人民公社,给准巴劳动人民带来的幸福是无限的,他们怎能不欢呼雀跃呢?!

### 三

昔日的流放者今天怎么样了?我们拜访了那些戴过“策果策加”的人。准巴人民公社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格列就是其中的一个。

五十三岁的格列,是三十年前流放到这里的人。标志“终身苦役”的脖枷,在他的脖子上套了整整十个年头;因为皮鞭的摧残,至今他的两腿还是不长新肉。那三千六百个苦难的日日夜夜,他是怎样度过的,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帮助他摘掉了“策果策加”。文化大革命以前,格列就担任准巴乡的乡长,文化大革命中,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到群众中间去,和群众并肩作战,狠揭猛批修正主义,率领贫下中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办社过程中,没有改造好的阶级敌人无耻地攻击他,甚至穷凶极恶地企图谋害他。饱经风霜的格列,风吹不转向,沙打不迷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雷打不动。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查出了阶级敌人暗藏的变天帐和杀人凶器,狠狠教训了那些妄想捣乱的坏家伙。公社成立以后,他连续三个冬春带领群众深入学

<sup>①</sup> 一克土地相当于一亩。

大寨，大干苦干，修完西水渠，又修东水渠，每年冬春都要在森林里住四、五个月。没有房子住，就用树枝搭个围子；钢钎冻得沾手，就在火上烤烤。一九七三年，这位解放前被压在十八层地狱下的流放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准巴人民公社的党支部书记。

坐在我们面前的七十六岁的单木增老人，也曾经是被判处“终身苦役”的流放者。他原是日喀则地区萨噶县的一个牧工。四十三年前，牧主之间因为争夺草场发生了械斗，他被迫参加厮杀，结果当了替罪羊，成了准巴的一名“犯人”。在准巴，他终日戴着脖枷上山割草，到森林里砍伐木料，被青冈树的枝桠刺瞎了一只眼。人民公社给单木增老人带来了幸福的晚年，按公社规定，他完全可以坐在家里休息，用不着再愁吃愁穿。但单木增老人说：“我不能把嘴放在公社的粮仓里，就是把我当成块石头，凑起来还能顶锅烧茶啊。”眼睛不好，做细活不成，他就主动为公社放牧大牲口。一次，往高山牧场送牛，半路上牛惊了，他也受了重伤。公社把他送到县医院，但只住了一个月，伤还没有好清，他就提前出院返回公社继续放牧。从他充满激情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单木增虽然老了，但为社会主义他还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 四

准巴公社还有七户珞巴族兄弟。他们的今昔变化，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些珞巴族兄弟，绝大部分都是准巴的农奴主从珞巴头人手里买来的，有的只换一头牛或几只山羊，有的只换一把刀，有的只换一串海螺珠子或两个铜钹。在万恶的旧社会，他们遭受着比藏族农奴更为骇人听闻的奴役。农奴主阶级诬蔑他们是“野人”、“鬼”，“吃老鼠、猴子的”，都是些“纳古冬古”<sup>①</sup>。张嘴就是“杀掉你们这些臭珞巴，卖了你们这些臭珞巴！”不和他们在一个锅里吃饭、喝水，不准他们穿藏装，不准他们和老爷们说话，也不准他们和老爷们在一起。这些珞巴族兄弟从小就被迫在险路上用头背东西，背筐的皮带在他们头上磨出了二寸宽的肉槽，连头盖骨都被勒出了深深的印痕。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家乡，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年龄，甚至连二十个以上的数字都数不上来……。民主改革运动把他们从火坑里解救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使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得到进一步的翻身解放。公社党支部书记格列告诉我们：名叫钢、阿本和古鲁的三个珞巴族青年，三年前被公社保送去上大学，青年夫妇大本和雅地到专区当了工人，另外一些珞巴族兄弟则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

我们访问了羌和达拉这一对同胞兄弟。四十四年前，他们的父母惨遭头人杀害后，一

<sup>①</sup> “纳古冬古”是思想简单、鼻子很短、喜怒无常的意思。



起被卖到这里当了奴隶，当时尧七岁，达拉才五岁。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七一年，达拉被选为加玉区革委会副主任；稍晚一点时间，准巴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时，尧也被群众推选为贫协主任。

真巧，达拉正在家中度假。他的藏族妻子德钦白姆，用喷香的酥油茶、又细又白的青稞粘粑和煮鸡蛋款待了我们。他们已有三个儿女，起居室设备齐全，仓库里的物资丰富，生活过得很幸福。交谈中，达拉副主任一再感谢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一再颂扬党的民族政策。他说：“过去在农奴主的眼里，我们这些‘臭洛巴’只是一些会说话的牲口。今天的幸福生活，全是毛主席、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洛巴人永远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永远要为边疆的建设努力工作。”

两天以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我们又碰上了达拉的哥哥尧。这位贫协主任正在卖力地和大家一起抬石头。听了尧的介绍才知道，这座规模可观的建筑叫洛巴接待站，是专为接待远方的洛巴族兄弟来进行边民小额贸易而修盖的。爽朗的尧一边笑着一边说：“那一年，群众选我当贫协主任，我说这是给小马驹背了个大鞍子，我顶不起来啊！群众说，尧，不要害怕，你就干吧，有党的英明领导，咱洛巴族和藏族紧密团结，我们什么都能干好。哈哈，后来我就干起来了。”尧停顿了一下，神情忽然变得异常严肃了：“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就是想叫我们这些人下台，让三大领主重新上台。这永远办不到！党让我们掌了权，我们就要握紧刀把子，掌好印把子，坚决专剥削阶级的政！谁胆敢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 五

尼玛杰布，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现在是公社党支部委员、总会计、第二生产队的会计，还兼任着公社小学的教员。

可想而知，那些流放者、流亡者和洛巴人，过去是绝对不可能读书识字的。民主改革以前，全乡二百四十七口人当中，有文化的只有一个溪堆和两个当过喇嘛的人，后两个还是只会念不会写。为了在文化上翻身，准巴人民群众做了许多努力。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曾派出尼玛杰布、格桑旺堆等五个青少年，到加玉区共荣乡的民办小学去学习，希望他们学一点就回来教教那些去不了的孩子们。但准巴到共荣有五、六十里山路，孩子们来回一趟很不方便，这个办法行不通。一九七三年准巴小学诞生，才使孩子们都有了上学机会。我们欣喜地看到，准巴的新一代，正在充满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小学里茁壮成长。历经沧桑的准巴的老一代，为摘掉文盲“帽子”，也在刻苦地学习文化，攻读革命理论。通过几年来政治文化夜校的帮助，现在，成年人中的识字者已有二十八人，个人和集体订阅的报

刊已达二十七份。

离公社小学不远的地方是公社的卫生室。这里有六十多种常用药物，有听诊器、水银柱血压计，还有五套注射器和全套针灸用品。准巴人民群众十分热爱他们的卫生室，没有病的人也常来这里坐一坐，看一看，或者帮助做些什么事情。文化大革命中培养起来的赤脚医生顿珠，提起他们的卫生室更是眉飞色舞，他自豪地说：“我们已经做到‘小病不出社，买货不到区’了。”

也许你会觉得“小病不出社，买货不到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在准巴，有了卫生室和供销社，可是个了不起的变化呢！面对这间小小的卫生室，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旧准巴的情状。由于没医没药，加上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那时的准巴，残废者真是多得惊人。据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时的一份统计，二百四十七个人当中，白痴、哑巴、畸形、瞎子和夫脖子就有一百零六人，占了人口总数的将近百分之四十三，以致有的村寨要推选一个干部都感到为难。那时候，也有人给人“治病”，但与其说是治病，不如说是害人。云游喇嘛阿旺桑登“治病”的方法就叫人毛骨悚然：对头痛的人他用刀子扎，对肚疼的人他用火来烫。女奴隶索朗卓玛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块打破了头，流血过多，头昏得站不起来，阿旺桑登又在她头上扎了一刀，还要放血，活活地被搞死了。光是阿旺桑登这一个“医生”，民主改革前后就“治”死了十个人。再看看今天：从民主改革到现在，准巴先后出生了一百零七人，个个健壮，没有一个残废。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二生产队政治队长诺布拉吉一家。诺布拉吉共有十二个孩子，六个生在民主改革前，其中四个有残疾；六个生在民主改革后，一个比一个聪敏，一个比一个壮实。这样一对比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准巴人民群众是那么样的拥护卫生革命了。

准巴的清晨和傍晚，景色都是美丽的。每当东方射出万道朝霞或西天染成一片桔红色，公社广播室的工作开始，山谷里就更加充满生气，一派欢腾。这时，北京的声音，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了祖国这块最边远的土地上。它象雨露，滋润着边疆人民的心田；它象号角，鼓舞着中华儿女高歌猛进。旧社会苦难极为深重的准巴人民群众，最热爱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永远心向北京。听吧，准巴人民群众又唱起了他们最喜欢唱的那支民歌：

“东方升起了幸福的太阳，

曙光照进了我们准巴乡。

这幸福的太阳就是毛主席，

我们要给他老人家献上最好的‘阿细’<sup>①</sup>。”

① “阿细”是一种质量最好的哈达。



一九七六年

第八期

总第三十六期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 4-192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定价: 0.25元